

記憶

REMEMBRANCE



张志新

1975.4.4

沈阳

老舍

1966.8.24

北京

顾圣婴

1967.1.13

上海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6月15日第13期 总第25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7期

目 录

【专稿】

郭予庆 建国初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与终结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辨析之一

【紅色文化】

李洁/文 度关山/译 毛时代主题博物馆与纪念物
——一份赠与未来策展人的调查与建议

【域外之音】

林 洛 法国艺术家为纪念纳粹受难者
——在斯格拉斯堡铺设第一批“绊脚石”

【书讯】

乔晞华 新书介绍：《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评论】

刘建业 大抓“516”的来龙去脉

石名岗 关于《文革的边缘人——农民阶层与文革》的几点看法

【随笔】

小 鹰 闭卷判分 名人归零

【封面】

邹 行 血色碎片——对文革纪念的思考

【本刊声明】

【专稿】

建国初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构想的提出与终结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辨析之一

郭予庆

1921年入党的刘少奇，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但在较长时间里在党内地位并不太高。刘少奇1943年跃升为排名毛泽东之后的三人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¹，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²。建国后的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在长达二十三年中，他始终是党的第二领导人，参与了党的所有重大决策，与其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但在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些方面的认识上发生了分歧，导致矛盾和裂痕产生。以至于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毛泽东被定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³，被彻底打倒。那么，刘少奇与毛泽东有哪些重要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刘少奇是否有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本文依据现有资料，对建国初，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的分歧进行梳理和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

毛泽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⁴。他指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75页。

2 1946年1月7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3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享有崇高威望。”《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一卷，121页。

3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批示过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首次不点名指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68页。

4 有学者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抗战时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宣言，是1945年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动员纲领，但一直停留在一种“说法”的层面，“从来没有认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案”。燕凌：《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炎黄春秋》2012年7期。

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¹，“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

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共同纲领》，刘少奇主张新中国成立后要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他把这段过程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1951年3月28日，他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²。

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要思路是：

第一、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³。

“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段时间，估计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⁴，1951年11月4日他在政协全国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的”⁵。

第二、他主张这个阶段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工业化，实行计划经济。他指出只要不发生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把中国工业化”⁶，“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开支外，其它一切工作和其他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⁷。他提出“力求走上计划经济——要资本家服从国家计划，小生产者受国家控制，……今后必须在国家统一的领导和计划下发展经济，不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完全自由地发展经济，没有国家的控制，或控制不确定不严格都是错误的”⁸。

第三、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国民经济⁹。应当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领导地位”¹⁰。“国家要集中资金及人力、财力来发展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644页。

2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2页。

3 《刘少奇论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14页。

4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年6期。

5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会议上讲话，1951年11月4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90页。

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59页，以下简称薄书。

7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39页。

8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39页。

9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27页、428页。

10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27页、428页。

国家企业。因此，它会发展很快，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它的领导作用与控制作用也会越来越大”，“私人资本主义也会发展，自然发展，资产阶级也会要加强一些，但它的发展速度要慢些，比重和作用反而减少”¹。这样发展的结果，达到“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²。

第四、他主张不要过早否定私有制。他说“私有制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一定的积极性”³，“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⁴，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对人民是无益的，伤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地是破坏当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⁵，过渡时期“不要侵犯私人资本主义财产”，“没收是打草惊蛇”⁶在农村，不要过早动摇、削弱个体经济，发挥个体经济的积极性，鼓励劳动致富，改变经济现状，提高农业生产力，待条件成熟时，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实际步骤。1951年7月，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报告中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讲早了十年”⁷。“中国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远的事情”⁸。

他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建设，“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要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⁹。

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下，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保存富农经济以及农业互助合作化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

1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39页。

2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27页、428页。

3 薄书，60页。

4 《刘少奇选集》上卷，62页。

5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1951年5月13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90页。

6 薄书，60页。

7 《刘少奇论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82页。

8 《刘少奇选集》上卷，435页。

9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541页。

（一）关于天津讲话¹

天津于1949年1月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了城市，社会秩序稳定，但恢复经济的工作出现困难。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恢复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不足30%²。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全市经济滑坡。造成困境的原因，除了城乡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原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是突出问题。

“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的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³。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于是，1949年4月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前往天津指导解决如何尽快恢复城市生产问题。

刘少奇抵达天津后，到各主要工厂企业调查，听取党政各领导部门的汇报，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干部、工人、资本家意见，发现工人和资本家都有许多模糊认识。

工人认为，“在乡下分（地主）地，在城市里还不是要分（资本家）”⁴，以为共产党允许分厂、分店。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发生53次自发的清算斗争⁵。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

资本家不了解共产党将如何对待资本家？担心清算分厂，顾虑将来是不是像农村消灭地主一样消灭资本家，因此普遍生产经营情绪不高，有的甚至准备弃厂携款外逃。

许多干部不了解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认为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找不到，看不见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⁶。

“对他们（资本家）很冷淡，不找他们，他们来了也不见他们”，“报纸上骂他们的多而表扬的少。在劳资关系上将工资和劳动条件定的高”，使得劳资关系紧张，生产效率因之降低。“贷款也不贷款给资本家，政府也不理他们，又不许解雇工人，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告贷无门，呼吁无门”⁷。

这些状况严重影响着几万私营中小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阻碍了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几十万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就不能解决。

1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时间为建国前夕（1949年4—5月），但讲话内容集中阐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思路，是他“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将天津讲话列入本文考察范围。

2 薄书，51页。

3 薄书，52页。

4 转引自《刘少奇传》，628页。

5 薄书，51页、52页。

6 刘少奇在天津干部会议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29页。

7 黄火青汇报天津私营企业问题的记录，1949年4月21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29页。

因此刘少奇把天津之行的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方面。一方面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时，根据党的政策，利用各种场合向广大干部工人解释中国的国情，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他说“中国经济中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百分之十的工业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所以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其进步性。”“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¹。1949年全国工业中私人经济占62.7%，国营经济占33.9%²，“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它不行”³。私营经济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国民经济是有利的⁴。

“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是在青年时代，正是发挥他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⁵。

针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思想问题，刘少奇分别在天津干部大会、职工大会和工商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痛苦”⁶。

“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剥削也要分清几种：奴隶剥削已经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我们也已经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今天还不能够废除”⁷。“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今天要限制它”，“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

1 黄火青传达刘少奇对天津工作指示，1949年6月20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1页。

2 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13页。

3 转引自薄书，52页。

4 黄敬传达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6月20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0页。

5 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记录，1949年5月2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1页。

6 刘少奇在天津干部会议上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转引《刘少奇传》，631页。

7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会议上讲话记录，1949年4月28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0页。

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¹。

为了解除资本家“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刘少奇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今天我国资本主义剥削不仅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消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²。

刘少奇批评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左”的倾向。他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做斗争对象，就要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还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避免，剥削是不好的，但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³。

他说劳资两利，就是使工人有钱可赚，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只求劳方一利，就会造成“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⁴。“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正像黄敬市长讲的：‘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⁵，“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对工人的好处多，坏处少”⁶。

刘少奇也讲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说：

工人和资本家是有斗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斗争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天生的，不能不斗的问题。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那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

1 刘少奇在天津干部会议上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转引《刘少奇传》，631页。

2 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记录，1949年5月2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1页。

3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会议上讲话，1949年4月28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2页。

4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讲话，1949年4月24日，《党的文献》，1999年4期。

5 《刘少奇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5页。

6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会议上讲话记录，1949年4月28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争到把将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市场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¹。

刘少奇还提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和平过渡的初步设想。他提出：新中国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就“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²。社会主义前途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前途，全国人民的前途，而且也是资本家的前途³。“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来走入社会主义”⁴。

在天津的近一个月内，他先后调查了工交、财贸等十几个行业，听取了二十多次汇报，做了十多次讲话。这些工作收到明显成效，很大程度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各界出现团结向上情绪，促进了天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业主要行业六、七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水平，九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四月份的293户增加到了380户，职工人数增加近百分之二十⁵。

刘少奇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密切相连的，总的来说正确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与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论述基本一致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⁶。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⁷。

1949年4月15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1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会议上讲话记录，1949年4月28日，转引自《刘少奇传》632页。

2 转引自薄书，53页。

3 刘少奇：1949年4月25日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4 刘少奇：1949年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5 转引自《刘少奇传》，637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6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1页。

二中全会决议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是限制而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往来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二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¹。

1950年4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²。

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上，党内有人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意见，他对此做出批语，对有人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批语：“今天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对有人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批语：“应限制和排斥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³。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向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⁴。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遵循毛泽东的思想的，但二者之间又有一些差别和歧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刘少奇则在赞同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利用和发展的一面，因此在有关“剥削”问

1 陶鲁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28页。

2 转引自薄书，9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9页。

4 《毛泽东选集》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5页。

题上讲了些过头话。当毛泽东听取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关于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汇报时，对天津讲话总是满意的，认为讲的好，但也认为“剥削越多越好”等语不妥¹。

刘少奇此后在七届四中上做自我批评时，谈到“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批评了当时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是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不够妥当的”²。这些话当时受到高岗的“激烈的攻击”。十七年后的文革中，戚本禹在批判文章中有意避开毛泽东当年对私人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论述，避开七届二中全会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的政策，对刘少奇天津讲话掐头掐尾，断章取义，宣称是刘少奇向资本家投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证³。

毛泽东 1952 年 9 月提出了现在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路，刘少奇积极响应，最早于 10 月提出十五年内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全部国有化改造的设想⁴。1953 年党中央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完全赞成，努力贯彻。此后，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思路完全转换到，如何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国有化改造，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

（二）关于保存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旧中国农村中带有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富农的人数不多，经济上不十分重要。土改前，富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 3.08%，富农所有土地占农村土地总量的 13.66%⁵。但对它采取怎样的政策，却对农民其他阶层（特别是富裕中农影响很大）以及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建国初期，党中央在决策土地改革政策时，分析新形势，讨论如何对待富农。1950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致电邓子恢并各中央局领导，提出暂时不动富农：

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时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

1 薄书，61 页，55 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83 页，25 页。

3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6 年版，627 页。

4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526 页。

5 廖鲁言：《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28 日。

建富农，待几年之后再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¹。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小土地出租者”²。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新区土改中，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³。

同年4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庆祝大会上的讲演中，公开宣布：今后的土地改革“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⁴。

1950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报告中指出：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是能争取富农中立的，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改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对于克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有利些”，“我们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政策，而是一种长期政策，就是说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⁵。

1950年6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出租之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之一部或全部。”该项法律颁布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土改中，富农出租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⁶。“在新解

1 《毛泽东选集》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3页。

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70页。

3 薄书，120页。

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2页。

5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9页，40页。

6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53页。

放区，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在宣传上和法令上都说要保存富农经济，但在农民斗争中，富农经济实际上已受到很大削弱”¹。

在1952年冬季和1953年春季的农村合作化高潮中，富农在农村中事实上成为不合法，1953年11月毛泽东审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宣布“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剥削”。标志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正式终止²。

在新区土改中实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没有分歧，但对这项政策的意义的认识上，二者是有差距的。刘少奇认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对于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生产中不必要的顾虑，对于克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有利。因而是一种长期政策，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要保存富农经济。毛泽东在谈到这项政策的意义时，着重点在于把它看作是顺利推进土改的策略，现在不动富农，“几年之后再动他们”。他们在这方面认识上的差距，为以后党内农村经济发展上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如何对待东北老区土改后出现的新富农问题，1950年春，刘少奇与东北局高岗发生了争论。东北大部分是1948年完成土改的，土改后大部分农民经济生活上升，其中一小部分添置了马车，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农民因劳动力缺乏或疾病等原因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借粮借款。有的党员开始雇工，有的村干部认为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应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道路。农民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富裕？这是党的农村政策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高岗1949年12月对此发表意见：“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走‘由个体逐步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他批评了各种要求单干思想，强调限制雇工、借贷、土地买卖和出租。在谈到党员雇工时，他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³。

这表明高岗主张土改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新民主主义阶段。之后，东北局就有关党员雇工问题写报告请示中央。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一定限度

1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28页。

2 薄书，137页。

3 转引自薄书，196页，197页。

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
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是错误的”¹。

同日刘少奇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等就东北土改后出现
新富农问题谈话：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不是
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
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
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
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雇工、单干，
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
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还是可以做社
会主义者的，……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
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²。

1950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新富农可以被选为劳动模范给
东北局的电报》中提出：“由贫雇农劳动起家的新富农是否可以被选为劳动模范问题，我
们认为是可以的”，“富农本人也是劳动者”，“只要新富农劳动好，对劳动有新发明和
创造，对雇农待遇好，合于劳模各种条件……就可以选为劳动模范”³。

东北与关内有不同特点，当时东北地广人稀，即使有劳动力，但没有牲口大车就无法
耕种。因此东北土改后，允许拴车买马雇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时有人讲，如果
东北的富农能每年吸收关内一百万失业人口，来开垦东北几千万亩荒地，对于增产粮食和
减少失业人口将是一大贡献⁴。

刘少奇关于东北农村发展问题的政策思路是：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过早地否
认个体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劳动致富，以提高农村生
产力发展。“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是农村经济向上发展的表现。应当允许

1 转引自薄书，196页，197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99页；薄书，198页。

3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437页。

4 薄书，199页。

新富农发展，不要过早限制。这些类似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是适合当时东北农村生产力发展需要的。

刘少奇上述主张与毛泽东关于对待新富农的思想是有差别和分歧的。毛泽东认为，“新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¹，现阶段虽然允许富农经济存在，但应当加以限制，达到逐步消灭。毛泽东指出：“片面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²，他对于农民个体经营的自发倾向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持有特别关注，主张尽量避免两极分化的后果。

刘少奇关于对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新富农可以当劳模的意见，被认为是有放任、鼓励农民单干、富农雇工剥削的错误倾向；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将来即使东北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等观点，当时被认为是有悖于党的组织原则。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刘少奇谈话的呢？现有的资料鲜有披露。仅有薄一波回忆录记载，高岗称，他将刘少奇讲话的记录稿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讲话表示不满³。但此说系他人转述，尚未得到现有文献资料的证实。但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支持了高岗的意见。

1951年10月17日，毛将高岗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批转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并转各中央局，各省委、地委，批示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⁴。

此后，刘少奇改变了认识。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作检查，并在工作中做出明确改变。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中处理富农成分党员党籍问题的新规定》中，亲笔写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它方式剥削的党员，“应无条件开除党籍”⁵。1952年7月2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给陕西省委电报中指出“农村共产党员不得雇工，进行富农式的剥削，否则，无条件开除其党籍”⁶。1953年10月，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做检查说：“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错误的话都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437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579页。

3 薄书，198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477页。

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243页。

6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351页。

应该取消和修正”¹。1954年2月，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检讨说：对富农党员如何处理，“我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²。

刘少奇的谈话当时受到高岗的批判。戚本禹在其文革批判文章中，隐匿毛刘当年同样主张在新区土改中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该政策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历史事实。对刘主张保存富农经济和鼓励东北个体农民劳动致富的观点，抽去历史背景，寻章摘句，歪曲原意，指称刘少奇“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迅速泛滥”³。

（三）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化问题

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党委递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在山西老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分析山西农业互助组的情况后认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省委主张：扶植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对于私有制，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⁴。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为慎重起见，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两次向刘少奇作了请示和汇报。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⁵。华北局5月14日批复山西省委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方法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在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指出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⁶。7月3日，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写下批语：

1 转引自《刘少奇传》，748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80页。

3 《戚本禹回忆录》，627页。

4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30页。

5 薄书，187页。

6 薄书，188页。

在土改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表现出来了，党内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这种趋势的目的。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例子¹。

在此前后刘少奇几次发表谈话，阐述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的观点。（刘少奇 1951 年 5 月 7 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的报告；6 月 3 日同薄一波等人谈话；7 月 5 日在与马列学院学员讲课时，都谈到这方面观点）。

7 月 25 日华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对报告作了多处修改，报告说：“会议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这种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下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的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化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在互助组内对私有财产不是巩固，而是逐步动摇、削弱以至否定，并企图由此走上集体化的方针，是错误的”²。

毛泽东得知刘少奇上述意见和谈话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³。这表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自发积极性。

1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183 页。

2 薄书，191 页。

3 薄书，191 页。

刘少奇认为互助组与集体农庄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¹。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集体化条件还不成熟。

他认为土改后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力量是不可避免的，不能阻止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要过早否定私有制，是要充分释放农民个体劳动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鼓励农民劳动致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对于个体经济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他指出“完全让农村经济自由发展也是不对的”。主张用互助组组织农民；用国家贸易及价格政策、税收政策限制富农；用集体主义教育农民等措施同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做斗争。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²。

毛泽东认为，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是继土改后的第二次生产关系改革，通过这种改革，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改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³。土改后，农民中蕴藏着强烈互助合作积极性，是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应鼓励、支持、扶植这种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庄的形式，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我国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⁴。

毛对于个体经济产生的两极分化持有特别的警觉，“片面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⁵，主张限制个体经济的自发性，动摇、削弱个体经济的自发势力，逐步达到最终否定私有制。

综上所述，在引导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个根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步骤上。刘少奇后来在检讨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时说：“我认为农业集体化的时间要慢，……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中间过渡形式没有找到”。而“毛主席的想法是农业生产的集体化要很快地搞，其形式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⁶。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党的第二领导人刘少奇的这些思想落后于实际，脱离了群众，并且已影响到了华北局的政策导向，这是严重的问题，亟需纠正，因此直接批评了刘少奇。

1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99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546页。

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0、71页。

4 《毛泽东选集》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68。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579页。

6 转引自《刘少奇传》，748页

刘少奇出于他一贯对毛泽东的敬佩、赞同、跟随和尊重的态度，完全接受了批评，自1951年秋就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互助合作化思想，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他连续三年在中央会议上做检讨。

1953年10月，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上讲话中做自我批评：我在农业生产互助组问题上，“曾经有一个时候有过一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主观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观上的可能和需要”¹。对他给山西省委《把老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示和对马列学院学员讲话中的观点进行检讨。

1954年2月，他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系统检讨中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农村土地改革后，要对我国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我是没有怀疑过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以为要等过一个时期才能在我国农村大量地，普遍地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没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由此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所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赞成推广；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我这个批评时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想法“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就抛弃了这种想法。”²（此检讨稿事先经毛审阅³）

1955年10月，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中，再次做检讨：“几年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个时期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⁴。

1 转引自《刘少奇传》，748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78，79页。

3 关于刘少奇这份自我批评，毛泽东是重视的。全会召开前的1954年1月7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议：全会上“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直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433页。根据毛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检讨稿。1月16日他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审阅和修改。”《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25页。毛阅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刘少奇传》，725页。

4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375页。

1952年7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复电中，同意东北局关于“农民小生产者经济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与党所领导的合作化道路的矛盾是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而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意见¹。④

1954年1月20日，他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列宁教导说，要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农业合作制。苏联早已完成了农业集体化，这对于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国家特别重要”²。

1955年上半年，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建议浙江省压缩了15000多个农业合作社。同年6月，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发生争论。据此，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人对合作化持消极态度。7月、9月、10月，毛连续严厉批评邓子恢，说他是“小脚女人”，犯了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刘少奇在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拥护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赞扬了毛泽东的贡献。他说：我们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将要到来：

一些同志则在斗争中表现不能容许的犹豫和动摇，被群众运动吓昏了头，从而阻碍群众运动，这在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在目前的革命斗争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坚决地彻底地纠正这种错误，如果不正确地系统地规定当前斗争的方针和具体办法，那么我们党就不能坚定地一往无前地领导群众把这个完成革命斗争推向前进，那我们党就要落在群众运动后面，脱离群众，那就要使当前的群众革命运动失去党的正确领导而引起混乱。正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这种紧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他的其他指示，恰好是及时地、正确而全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所作的又一次大贡献³。

在排除了党内不同意见后，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96.1%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原计划用15年左右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短短4年就完成了。为而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基础条件。

1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309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32页。

3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卷，368页。

在互助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视角看，建国初，农民的经济力量十分脆弱单薄，生产力低下。刘少奇关于不要过早否认私有制，充分发挥个体劳动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变经济现状，脱贫致富，待条件成熟后，再向集体化过渡的观点，有利于在生产力提高和积累的基础上，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平稳过渡，避免震荡和摇摆。因而是较符合实际的。

然而，从七十年来我国农业曲折发展的轨迹来看，建国初，建立的合作社体制及人民公社体制，由于受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存在明显的缺陷。

关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依靠工场分工可以形成新生产力，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也可以形成新生产力，进而去动摇私有基础的认识，忽视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显著的不同特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

农业再生产是同自然生态系统再生产相互交织的复合再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最大。马克思指出：“在所有生产部门都有再生产，但这同生产联系的再生产只有农业中才是同自然的再生产一致的”¹。这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最显著的不同。

工业生产是由工人集中在固定的场所空间内，以整齐划一的分工协作，服从统一的调度、指令完成生产的，很少受气候的影响。因而手工工场的紧密分工协作，集中劳动所创造的生产力要远大于分散的个体手工业。

而农业则受气候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最大。农业生产是由农民分散于敞开的田野空间中进行的，农民在不同的地块，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播种、灌溉、施肥、收获等各种农事作业，需要因时制宜，因作物制宜，因此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转移、变换和分散的特点。同时，气候条件的复杂多变性和不可控性，使农业生产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因此农业生产难以像工业生产那样按照预先的精准设计，接受统一的指令，进行标准化批量生产。所以在农业领域“靠统一经营”未必能形成新生产力。在农业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的条件下，独立劳动具有一定优越性。家庭经营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自主决策，灵活应对气候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调配农业资源，生产成本更小，激励机制更强，因此是农业生产中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和经营主体。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家庭农场和小农家庭经营仍然是普遍的农业经营模式。在人均耕地最多，农业规模化、社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经营的主体。据统

¹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册，61页。

计, 美国国家 200 万家农场中, 家庭农场占 85%¹。在人均耕地最少, 土地细碎化严重的日本, 农业同样是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

在我国, 1978 年, 由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发起的包产到户, 首先打破长达二十多年的体制坚冰, 之后, 短短几年内半个体经济性质的家庭承包制就迅速实行于全国各地。这是农业生产力强盛的内在呼唤和要求, 是对原有体制弊端的矫正和否定, 是历史的选择。这证明生活实践之树常青, 而理论常常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 虽然随着规模化程度的提高, 农业社会组织的发展, 一些土地进入流转, 但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 2016 年全国 76.6% 的耕地仍由家庭承包者自家经营²。

二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终结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

刘少奇关于革命胜利后实行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政策, 待条件成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 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 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1948 年 9 月, 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刘少奇做《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报告说, 民主革命胜利后, “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 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报告分析了不能过早实行社会主义的理由,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在总结发言中说: “关于新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问题, 刘少奇的提纲分析的很具体, 很好, 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³。

1950 年 6 月,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闭幕词中指出: “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是在很远的将来)”, 只有“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 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 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 就可以从容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⁴。

1 《美国、德国和日本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农业》2016 年 11 期。

2 陈锡文: 《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爱思想网。

3 转引自薄书, 49 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 416 页。

1951年3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事前刘少奇将报告稿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批示“看过，同意”¹。

同时期，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与毛、刘相同的观点。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大家都还是说搞社会主义要十五年左右”²。1949年7月，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讲话：“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然后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³。1949年3月，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能到社会主义”⁴。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有了新思路。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⁵，毛泽东这个新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⁶，与刘少奇产生了分歧和差距。

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完整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错误”⁷。

（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终结

毛泽东同时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刘少奇等党内一些领导人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⁸：“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206页

2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66页。

3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

4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页。

5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6 薄书，215页，66页。

7 《毛泽东选集》五卷，81、82页

8 薄书，215页，66页。

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¹。

在此之前，毛泽东视察外地时，1953年2月17日在与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谈话时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²。

1953年12月7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³。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央审议，认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中，“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此提法出自刘少奇该会议报告）⁴，“应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⁵。以上毛泽东的讲话、批示和中央通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过渡周期的长与短，过渡步骤的快与慢方面。

刘少奇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以后”（1951年5月）⁶，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十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⁷。毛泽东非常看重中国向社会主义推进的速度，他强调：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⁸。在他看来，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年二十年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而去搞社会主义，要犯右倾错误。作为党的第二领导人刘少奇有这种认识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对其击一猛掌，促其向前跨进一步。

1 《毛泽东选集》五卷，81、82页

2 《毛泽东在湖北》，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2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403页。

4 《刘少奇选集》下卷，62页。

5 《党的学说文件汇编》第3册，中央党校教学参考资料，167页。

6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689页。

7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36页。

8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1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326页。

刘少奇是如何面对、直接回应毛泽东的批评呢？现有资料没有披露。但是，此后刘少奇连续三年在中央会议上，就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相关联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新富农经济和互助合作化等问题做出了深刻、系统的自我批评（如前所述）。

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是维持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现状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¹。

这些表明，刘少奇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转变了认识，自我否定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就此终结，

对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完全赞同，积极贯彻，努力把自己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后，刘少奇积极响应，于同年10月最早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内容提出初步设想：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十年后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营工业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到那时，我们将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国有化时，设想多数情况采取和平的方式。“准备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里，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的集体化”。“对于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²。

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报告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基本内容。随后，他主持全会正式批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层面看，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后果看，刘少奇主张建国后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反对“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³，在提高生产力，积累和准备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是比较务实的，有利

1 《刘少奇选集》下卷，144页。

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四册，526页。

3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30页。

于在稳固的基础上平稳有序地向社会主义过渡，避免由于急躁冒进留下的后遗症和急于求成的风气。

三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全党工作发出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¹。

刘少奇积极贯彻。1955年12月5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工作部署。他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泼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绩，这就是现在中央的路线，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没有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²。

同时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速度提出要求和督促。1955年1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改造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全面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³。

同年12月5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12月20日，他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提出：手工业改造不应比农业慢，要求手工业合作化要1956、1957年两年搞完，“时间拉长了问题反多了”⁴。

这些表明，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方面，刘少奇已经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在思想上同毛泽东保持了一致。

在毛泽东、刘少奇等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倡导、推动和督促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路高歌猛进，至1956年底，原定用十五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短短三年就完成了。

1 转引自《刘少奇传》，777页。

2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刘少奇传》，776页。

3 《刘少奇选集下卷》，176页。

4 薄书，448页。

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毛泽东、刘少奇那一代领导人共同一致的社会主义观¹。由于受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毛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他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在实行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²。

1952年12月，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写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他在这句话之后，写下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³。

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总路线的报告中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⁴。

1953年10月15日，他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当时城乡粮、棉、蔬菜供需矛盾时，他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⁵。

1955年10月，他在七届六中全会做结论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⁶。

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刘少奇有同样的认识。

1951年3月，他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提纲中写到：“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⁷。

1953年7月，他在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消灭资产阶级决定的一招，就是这个全行业的公私合营⁸。

1954年9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1 毛泽东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359页。

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记录，转引自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1月。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702页。

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359页。

6 《毛选》五卷，217页。

7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2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592页。

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道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已经走到了绝路，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已经繁荣强大起来。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局势下……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道路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¹。

1955年4月，他在中央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²。

1955年1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讲话：现在我们要全面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³。

上述认为只有使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经济基础的观点，已被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达1亿户，提供了60%以上的GDP，48%的外贸出口，50%以上的税收，80%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岗位，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力量，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并存构成了混合经济结构，显示了蓬勃的活力和生机。

（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逐步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效仿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该体制在运行初期，以高度的动员力，最大限度调配社会资源，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工业化基础和集聚了国力，体现了“集中力量办

1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2页、143、144页。

2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3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46页。

大事”的优势。但在持续运行中其内在缺陷逐步显现，至文革中达到了极端。物极必反，才有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回顾历史时坦承：“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¹，他总结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²，“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³，“我们耽误了几十年”⁴。

正是汲取过往经验教训后，邓小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⁵。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根据他的理论建立了多元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步入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轨道，从而取得改革开放四十年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进步和成就。

考察建国初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方面，刘少奇与毛泽东分歧的产生与消弭的轨迹，给人留下几点深刻的印象和思索。

首先，在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方向上，刘少奇与毛泽东是明确一致的，刘少奇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然而，由于受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和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社会主义观是有缺陷的。

第二，他们之间的分歧点属于策略或枝节的性质。如互助合作化发展的快与慢，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期的长与短等方面。其中，刘少奇有些主张，如注重稳健发展，发展阶段之间平稳衔接与过渡等的观点，相对于急于消灭私有制、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务实，比较讲求实际。但一生怀有浪漫情怀的毛泽东，“心潮逐浪高”，永远站立革命潮头，将潮流不断推向高峰。常常将不能快马加鞭，勇往直进的的人，视为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批评为右倾。因而对刘少奇进行了或直接或严厉的批评。而在刘少奇方面，他在党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4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在深圳国贸大厦的讲话，《1992，邓小平在广东》，《秋光》2018年9期。此句话收入邓选时，表述为“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内地位擢升过程中，毛泽东的欣赏、支持、提携起到了决定作用¹。因而长久以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形成了信服、拥戴、尊崇和依赖的关系²。所以，他每次都能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深刻检讨，放弃自己原有的认识，努力将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消弭。

第三，“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建国初，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的分歧是否给他们长久以来的密切合作关系投下了些许阴影？是否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而为以后发生更大的分歧埋下伏笔？有一线索令人回味，据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的回忆录记载，1953年初毛泽东曾布置高岗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³。详情语焉不详，有待于有关档案资料的解密而准确展示。📖

【红色文化】

毛时代主题博物馆与纪念物

一份赠与未来策展人的调查与建议

李洁/文 度关山/译

1986年，著名作家巴金呼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将“动乱年代”的记忆传递给后人，为了“不让历史重演”⁴。自彼时起，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景，虽

1 1941年毛泽东电召刘少奇回延安，“少奇在路上差不多走了十个月的时间，毛主席无时不在挂念。对少奇的的安全这样关怀备至，在不少人的亲闻中是很少有的。”“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刘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75页。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抵达延安。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一举越过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陈云等，就任排名毛泽东之后的三人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刘少奇年谱》，416页。

2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中国无产阶级……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刘少奇选集》上卷，319页，334页。何方评论说：刘少奇“这个报告是制造个人崇拜的标本”。《记忆》243期，56页。

3 《百年潮》2007年5期；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⁴ 巴金，《“文革”博物馆》，载《随想录》（香港：三联书店，1988），第601-604页。本文英文版可见：<http://www.cnd.org/cr/english/articles/bajin.htm>（最近访问：2014年6月11日）

然毛泽东时代的纪念品在纪念品市场上比比皆是，然而在当今的中国，还没有出现巴金最初所设想的那座博物馆：年轻人可以在其中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狂暴的群众运动之起因和影响，了解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一代的激情、创伤与在运动中的同谋身份。建造一座纪念性博物馆的想法依然具有其紧迫性和共鸣性，但是，在其适当的形式与内容方面，在其受众与信息方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和谐¹。文革博物馆的概念不再像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座混凝土纪念碑，而是一种强有力的、发散性的意向，在这种意向中，对毛泽东时代的不同记忆和理解彼此交织在一起。

在本文中，我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文革博物馆进行系谱学的梳理，分析中国现存的、带有毛时代记忆的实体场所，并且提出若干策展建议。通过考察毛泽东时代文化产品之“文明”主题的博物馆、以及“灾难”或“人祸”主题的纪念馆，我研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场所的创建、维护和疏忽背后的主事（agent）²；将过去延续到现在的形式和媒介；以及这些场所可能传递给真实或者虚拟访问者的意义。我认为，与其建立一座单一的博物馆来容纳一个国家的记忆，不如建立多个记忆场所，让创伤和怀旧得以清晰地表达，让人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乌托邦理想，并清算它所带来的人力与生命的代价。此外，毛泽东时代的公共记忆产物可以创造性地继承和转换一些毛时代的文化实践，从“诉苦”的仪式到代际对话的机会，从“深入群众”到收集“记忆子集”的“赤脚历史学家”。

想象一座文革博物馆

巴金意识到，在文革结束之后还不到十年，就已经出现了历史遗忘，他希望这一代人逐渐消失的记忆能够比他们的生命更长久，能够传递给子孙后代。在巴金的设想中，文革博物馆会“展出具体的、实在的东西”，并且“重建惊心动魄的真实场景”。在末日审判

¹ 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尤其是第916-940页，第1004-1016页。

² 译注：在语言学中，主事（agent）是事件的原因或引发的动机。主事也可以是“主题角色”（也称为“主题关系”）的名称。

的钟声中，文革博物馆会向游客们呈现“事件进程”的全景历史，以及“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文革博物馆的目的是，在十年的暴力、谎言和不公——“我们的同胞遭遇羞辱和非人的折磨，在那些大动乱中，真相与谎言被颠倒，黑与白被混淆，忠诚和叛国彼此错位”¹——之后，重新建立道德的明确性和人文主义价值观。

似乎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巴金在他的随笔集《随想录》中，充分反思了自己参与迫害友人，屈服于自我羞辱之仪式的过往。其中一些文章为文革博物馆应该或者不应该展出什么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例如，他写到了自己在听到邻居哼唱来自样板戏——在文革十年中，样板戏的阴影笼罩在媒体的上空——的曲调后做了噩梦。对于他和很多曾经被批判为“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与干部而言，样板戏代表了创伤性的图景与声音，因为他们的迫害者冒充了样板戏中的“英雄”，并且将他们视为“敌人”。²于是，巴金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产品，如果被展出的话，应该作为被历史暴力所污染的压迫性宣传、而不是无辜的艺术品被呈现：“在人血中绽放的鲜花明艳和美丽，但它们是有毒的。”³因此，巴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没有任何怀旧的余地。

在1986年和1987年，巴金的文章在各大报纸上转载，甚至在电台中播出。1988年，叶永烈——一位以撰写重要历史人物传记闻名的报告文学家，发表了一篇题为《巴金的梦》的短篇小说，在小说中，叶永烈自称是上海博物馆协会的“秘书”，并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规划一座文革博物馆。随着故事的展开，在委员会向公众发出征求建议的呼吁之后，收到了来自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将近三万封信来支持这项举措，来信提供了资金捐赠、文物收藏和想象的蓝图。大多数人都认为，天安门广场是理想的场所，而对于博物馆的颜

¹ 巴金，《“文革”博物馆》，第601、603页。

² 巴金，《样板戏》，载《随想录》，第594-596页。

³ 巴金，《“文革”博物馆》，第603页。

色，意见则分为若干派——红色，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激情；黑色，唤醒灾难的记忆；或者白色，正是哀悼的颜色。一个有趣的建议是，在博物馆的主入口处，将“林彪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位头目的雕刻头像钉在永恒的耻辱柱上，而叶永烈的老师则建议在天安门广场的地下建造一座地狱般的“灵魂博物馆”——鉴于文革被称为“一场触动人们灵魂的革命”。进入博物馆，走过一条长长的、挂满大字报的走廊之后，是三个用于展出三种不同形状的灵魂的展厅。“方形灵魂”，就像砚台一样，被墨汁染黑无数次，却依然不失其“方正”，代表着英雄与烈士，比如彭德怀和张志新。“三角灵魂”，就像匕首一样，在人背后狠狠地捅刀子，代表着文革中的恶棍，比如林彪和江青。最后，是“圆形灵魂”，就像随着时间流逝被打磨得愈发圆滑的鹅卵石那样，代表着那些既不伤害他人，也不抵抗暴政的人们。在博物馆的出口，会展出棍棒、鞭子、告发信、手铐和各种各样愚蠢的帽子：在这面“镜子”的凶光之中，访客们会反思他们自己的灵魂形状。然而，为了建造这样一座博物馆，需要五十个官方印章批准，而在描述了一场卡夫卡式的旅程之后，委员会只获得了前十枚印章，小说在此戛然而止，以规划委员会对自己的白日梦的苦笑而告终。¹

事实上，尽管巴金的呼吁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明确规定、禁止出版任何关于“文革”的作品时，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文革博物馆就只可能是一场荒诞的幻想。²1989年后，对文革博物馆的念想陷入了冬眠的状态，一直到几年之后，1990年代初，在毛泽东纪念品市场蓬勃发展的“毛泽东热”中苏醒。³“红色收藏家”们声称，他们所珍

¹ 叶永烈的这篇短篇小说写于1986年，于1988年首次发表在四川的一份科幻小说杂志之上；后来再次出版的时候，更名为《“文革”博物馆之梦》。全文见文化大革命虚拟博物馆网站创刊号：<http://www.cndeorg/CR/ZK96/zk77-2.hz8.html>（最近访问：2014年6月11日）

² 中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新闻出版法汇编（1949-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法规司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31-232页。其英文版本，参见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编，《中国文革（1966-1969）：不是请客吃饭》（*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纽约，阿蒙克市：M.E.夏普出版社，1966），第310-312页。

³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毛泽东的阴影：伟大领袖的死后崇拜》（*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纽约，阿蒙克市：M.E.夏普出版社，1996），第3-74页。

藏的毛泽东像章，宣传海报和其它“革命性”的日常用品，实际上就是文革博物馆。¹文革主题餐厅用旧宣传海报来装饰它们的墙壁，上演红卫兵歌舞表演，供应知青们曾经吃过的菜肴，餐厅老板们还援引巴金的话，将他们的餐厅描述为迷你博物馆和公共纪念空间。²这种空间带着淡淡的娱乐性怀旧色彩，旨在带人们回到年轻时代的“红色旧岁月”，而不是警告人们勿让灾难重演。这些“博物馆”不是用来纪念英雄、控告恶人，也不是用来纪念受害者们遭受创伤的身心，而是用文革时代的大众文化产品再现文革，将昔日的崇拜对象转化为对商品的盲目狂热。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将文化产品当作消费对象而非反思对象，可能会将宣传幻想与历史真实混淆，从而助长集体失忆，无益于保存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记忆。³从这个意义上讲，于是说它们是实践了巴金最初的提议，倒不如说是一种拙劣的嘲弄。

然而，除了私人的“红色”文物收藏和主题空间之外，很多人也开始在平面和虚拟媒体上建设文革博物馆。1995年，摄影编辑杨克林在香港出版了一套题为《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大型两卷本作品，通过历史照片和文件展示了文革十年的编年史。巴金为这本图册题词，图册分为12个“展馆”，包括“起源馆”、“造神馆”、“‘文攻武卫’馆”、“文艺馆”、“‘再教育’馆”、“经济馆”等主题馆。⁴杨克林的书只是上世纪90年代

¹ 梅利莎·施里夫特 (Melissa Schrift)，《毛主席像章传记：个人崇拜的创造与大众消费》(Biography of a Chairman Mao Badge: The Creation and Mass Consumption of a Personality Cult)，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第169-200页。

² 珍妮弗·哈伯特 (Jennifer Hubbert)，《革命是请客吃饭：当代中国的文革餐厅》(Revolution Is a Dinner Party: Cultural Revolution Restaur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评论：大中华跨学科期刊》(China Review: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第5卷，第2期(2005)，第123-148页。

³ 徐贲，《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解读三种文革记忆》，载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第916-940页。

⁴ 杨克林编，《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香港：东方出版社，1995)。

和 2000 年代出版的、众多文革史料、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文集中的一本，这些书大多在香港出版，以逃避中国大陆的审查。¹

1996 年春，第一座虚拟文革博物馆在网络中文期刊《华夏文摘》（CND）网站上线，该网站基于海外，并且在中国大陆被封杀。《华夏文摘》呼吁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截止 2014 年夏天，已经发表了关于文革主题的 700 多期专刊。博物馆的内容几乎完全由文本材料构成，它们被分别列入八个“展厅”，比如“文献资料”和“文艺作品”等。²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国内外涌现了许多致力于文化大革命主题的网站。³大多数网站仍然类似于被动存储记忆的数据库和档案馆，而不是能够主动地纪念的博物馆，但是它们也通过论坛讨论来鼓励用户参与其中从而做出贡献。并且，虽然虚拟展品不像实物展品那么有形，但是图像、声音和电影的多媒体展示仍然可以创造出与过去之间的、生动且发自内心的接触。事实上，在虚拟的文革博物馆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展品”之一，是胡杰拍摄的一部关于卞仲耘之死的纪录片，卞仲耘是第一位被学生殴打致死的北京教师，死于 1966 年 8 月。这部纪录片基于卞仲耘的丈夫收集的照片和其它私人遗物，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 2000

¹ 有关文革研究和中文出版物的概述，见徐有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与方法》，载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 2-32 页。为了探讨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史是如何为这一历史时期提供另一种史学的，见苏珊娜·魏格琳-施威德齐克 (Susanne Weigelin-Schwiebrzik)，《应对创伤：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历史和非官方历史》(Coping with the Trauma: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未发表论文，2005，见：http://www.univie.ac.at/Sinologie/repository/seGG430_OfficialAndUnoffHistCultRev/culturalRevolutionTrauma.pdf

(最近访问：2014 年 6 月 11 日)

² 该网站的英文主页，见 <http://www.cnd.org/CR/english/> (最近访问：2014 年 6 月 11 日)

³ 关于虚拟博物馆的概述，见杨国斌：《殉道者江青的画像：互联网上的中国文革》(A Portrait of Martyr Jiang Q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Internet)，载《重新审视中国革命：集体记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与诗意》(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李奇与杨国斌主编 (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第 245-286 页。

年成立的、旨在纪念文革受害者的“中国文革受害者纪念园”网站上，这是唯一一部被收录的视听展览作品。¹

文革博物馆的支持者经常把那个时期的暴力与犹太大屠杀（Holocaust）相提并论，在世界范围内，犹太大屠杀是国家暴力行为下的人类苦难的象征。²甚至中国的官方博物馆，也开始借鉴犹太大屠杀的博物馆学来纪念南京大屠杀和其它的战时暴行。³然而，把犹太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简单地等同起来，却几乎没有揭示苦难的原因，反而可能会为讨论的话题制造禁忌，或引发受害者之间“比惨”的无益辩论——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称之为“苦难的奥林匹克”。⁴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成长于毛时代的中国女性》一书的编者所写道：

如今，似乎达到道德制高点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指责某人要么像希特勒，要么像希特勒的盲目追随者，甚至奇怪的是，像希特勒的无助受害者……这种指责本身往往变成一种“高帽子”，就像在文革期间被轻易地扣在被指定的敌人头上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文革的教训还有待人们充分学习，但这只能通过受害者和施害者——即“无助”（因此是“好的”）的中国人和“邪恶”的中国人——的二分法框架来实现吗？⁵

¹ 李洁，《禁忌记忆的虚拟博物馆：胡杰的文革纪录片》（*Virtual Museums of Forbidden Memories: Hu Jie's Documentary Film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21，第3期（2009），第538-550页。

² 舒衡哲（Vera Schwarcz），《记忆的负担：文化大革命与犹太大屠杀》（*Burden of Memor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Holocaust*），《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11，第1期（1996），第1-13页。支持这种比较的人提出若干种相似之处，比如中国民众和德国民众对救世主独裁者的狂热支持，比如“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与“破四旧”，集中营与劳改营。

³ 柯克·丹顿（Kirk Denton），《展现过去：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博物馆政治》（*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4），第138页。

⁴ 伊恩·布鲁马，《受害者的欢愉与冒险》（*The Joys and Perils of Victimhood*），《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46（1999），第4-8页。

⁵ 钟雪平（音），王政（音），白迪（音）编，《我们中的一些人：成长于毛时代的中国女性》（*Some of Us: Women Growing Up Under Mao*），（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第xviii页。

使用与纳粹有关的“高帽子”掩盖了毛泽东主义乌托邦愿景的力量和吸引力——这种乌托邦愿景动员了大众参与，也掩盖了治安维护者暴力的循环，即某一场运动的受害者可能正是之前的一场运动中的施害者。如果一座文革博物馆呼应巴金的号召，对共犯行为进行审查，在指责施暴者的同时只同情受害者似乎是不够的。相反，一个更有成效的国际性比较应该是思考犯罪者和同谋者所在的国家如何接受其不光彩的过去。在这方面，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纪念它曾经犯下的罪行下的受害者，反思国家公民的共谋，以及在当代景观中保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遗迹。正是因为这种层次丰富、充满活力的纪念文化，我在给未来策展人的建议中，将经常提到德国的情况。

在他 2005 年去世之前，巴金本人从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来实现他的愿景。相反，他关于文革博物馆的提议经历了多次拨款、修改和争论。人们批评巴金，说他在他的博物馆中没有提到毛泽东的位置，他的回忆录也从未偏离 1981 年关于党史的官方决议。巴金仅仅指出文革十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而没有追溯其历史根源，他没有讨论更早期的群众运动，比如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或者 1959 至 1961 年的大跃进，在这些运动中，死亡人数比在文化大革命中多得多，但引起的公众关注却少得多，因为它们的受害者是农民，而不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巴金的文革博物馆强调精英阶层所受的苦难，无法容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体性，对于工农阶级来说，他们印象中的毛时代是一个资源稀缺、有价值的物品会被剥夺的年代；是一个有工作保障，有免费医疗和街道安全的时代；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的社区，无私的理想主义和天真的美德的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场纯粹的灾难，而是一个具有历史可能性的时期，因为它为自由表达不同意见和对现状进行正义的抗议提供了一线机会。¹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这种怀念不仅源于官方的灌输，也源于亲身经历——很可能成为批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一种素材。然而，

¹ 吴翎君，《位于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

关于毛时代如此丰富的记忆，只会让人们更加认为文革博物馆是一个强大的意向（topos）¹¹，不是一座位于首都的混凝土纪念碑，而是一个能够让来自毛时代的、充满争议的记忆彼此交汇的话语场所。现在让我们来探索中国当代景观中毛时代记忆的地形学。

对既有纪念场所的考察

近年来，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博物馆产业日益繁荣，这种繁荣一方面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另一方面也受到地方性经济举措的推动。²尽管北京和上海的官方历史博物馆对毛时代的描述含糊而过，并且往往跳过了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的创伤性政治运动，但有一些机构已经开始挖掘地方性历史旧貌的、更敏感的层面。³下面的考察包括中国的一些实体场所和公共访问的网站，它们都承载着对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记忆。这一部分将不涉及私人空间、室内空间和家庭空间——除非这些私人记忆已经被传递给公众；我也不考虑那些只以纸质或虚拟形式存在的博物馆。这里考察的记忆空间占据了景观中的实际空间，通过其物质性的遗存，与过去有着想象的、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切实有形的联系。同时，它们还必须与后社会主义的转型进行协商。把记忆铭刻在这些场所中的媒介包括它们的原始创造者、自然和历史的侵蚀或复兴，以及那些居住或参观过这个场所的、来自过去和现在的人，他们为这个地方赋予个人性的意义。我将记忆场所分为两类，其一是那些主要关注文化产物的文化的场所，其二是那些专注于社会剧变或者生命牺牲的场所。

来自毛时代的博物馆：大邑地主庄园

¹ 译注：意象（topos）是在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具有唤起特定联想或情感功能的主题或概念。

² 丹顿，《展现过去》，第1-26页。

³ 同上，第73、92页。

让我们从四川省大邑县的一座名为安仁的小镇开始，这里是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阶级斗争”博物馆的所在地，也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的所在地。这座“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原为当地大地主刘文彩的住所，于1959年向公众开放，在1965年设置了真人大小的泥塑群雕“收租院”之后，陈列馆在全国范围内一举成名。“收租院”系列雕塑由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生动地描述了农民的苦难与地主及其走狗的残忍。“收租院”的故事随后被改编为插图、海报、漫画和电影，被认为是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驱者。1968年的一份目录中写道：“收租院作为对过去岁月的残酷提醒，中国人民前来参观，于是他们永远不会——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忘记阶级斗争。”¹1960年代和1970年代，庄园博物馆接待了数以千万计的访客，但到了1980年代，随着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减弱，博物馆的参观者数量逐渐减少。²然而，近年来，博物馆再次成为旅游胜地，它因当代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而声名鹊起——蔡国强为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创作了一个有争议的、新版本的“收租院”群雕。³大约在同一时期，流行的修正主义史学开始把这位邪恶的大地主描绘成一个善良的慈善家，并揭露了一些流传已久的恐怖事件——比如关押拖欠租金的佃户的“水牢”——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捏造。⁴

这座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地方博物馆，在一波又一波的声望与恶名中，成功地过渡到了后社会主义时代。2009年和2013年的夏天，在蜂拥而至的游客中，我两次访问了这座庄

¹ 《收租院：压迫与反抗的泥塑群像》（*Rent Collection Courtyard: Sculptures of Oppression and Revolt*）（北京：外文出版社，1968），第5页。

² 吴金钟，《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第1页；莫琳·海恩斯（Maureen Hynes），《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多伦多：妇女教育出版社，1981），第109页。

³ 林似竹（Britta Erickson），《收租院的前世今生》（*The Rent Collection Courtyard, Past and Present*），载《动乱中的艺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Art in Turmoi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编（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第121-135页。

⁴ 笑蜀，《刘文彩真相》（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园博物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已经更名为“刘氏庄园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参观者来说，它的书面和口头讲稿都强调了刘文彩个人的传记和刘氏家族世系，而不再将他塑造为封建“旧社会”的恶魔。刘文彩的物质财富，他的成群妻妾，以及他所受到的当地民兵的保护，通过富人和穷人的双重视角来呈现，好似一把欲望与憎恨的双刃剑。在访问过程中，我无意间听到其他游客的窃窃私语：“**这些**就是一个地主拥有的全部奢侈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座博物馆已经变成了另一座属于富绅阶层的宅邸，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小城镇兴起的遗产旅游的基础。导游们在讲解创作工具和“收租院”雕塑的时候，会试图将革命神话与历史事实区分，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雕塑系列的。如果说阶级斗争的内容比之前设想的更加模糊，那么人们至少有可能重申雕塑的“艺术”价值。

在刘氏庄园博物馆，游客们重温了两种过去：阶级斗争在革命发生前的神秘过去，以及更近期的毛泽东时代的神话创造。除了区分“真假”刘文彩之外，参观者可以了解历史叙事如何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见证性博物馆”如何服务于宣传目的。它们戏剧性的善恶二分法一定会激发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仇恨，这反过来又使对正义和复仇的愿望合法化。因此，革命暴力的心理起源与其说是麻木不仁和恶毒，不如说是一种被误导的正义感。未来的毛时代博物馆馆长应该被预先警告，不要进行这种摩尼教式的呈现，将红卫兵，造反领导或者地方干部妖魔化，以取代资本家和地主的位置。一座优秀的纪念馆除了证实暴行之外，还应显示曾经的受压迫者的正义如何很容易地变成不正义，并警惕恐怖室的情感操纵。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红色时代系列

从刘文彩的庄园出发，乘坐十分钟的三轮车，就来到了巨大的建川博物馆聚落，2005年，一位对收藏充满热情的房地产开发商樊建川创立了这个聚落。我的三轮车司机是当地人，他声称他的祖父曾经是刘文彩的佃农，而他现在为樊建川工作，他对我说“镇上的新

地主”可是“比刘文彩有钱多了”。随后他又补充道“刘文彩和樊建川都是好地主”，因为他们都为他的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并且发展了安仁镇的经济。地主刘文彩只是收集了一些宝石和珠宝，樊建川却收集了数以千万计的现代历史文物，他购买了安仁镇三十三顷土地，并且建造了数十座博物馆，这些博物馆被分为四个系列，或者主题——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民俗系列和四川地震系列——聚落还包括配套的设施，比如红卫兵旅馆，人民公社餐厅，革命样板戏主题茶室，还有各种纪念品商店。¹在展览会场之外，扩音器里播放着“红歌”，包括献给毛主席的赞歌和来自19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制服让人立刻能联想到红军士兵和红卫兵，在视觉上混淆了抗战和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从而利用前者使后者合法化。

樊建川声称，在巴金呼吁建造文革博物馆二十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收集文革文物了。1966年，9岁的樊建川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他的干部父亲会被批判和监禁，他收集了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章和油印小册子。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他的身份从知青变成士兵，又变成学生、干部，他依然保持着收集这项业余爱好，不过，一直到199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忙着搬家的时候，文革文物才从私人住宅流向了跳蚤市场。自从1990年代起，樊建川通过投身房地产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满足自己对收集的狂热，他每年都要从遍布全国的跳蚤市场联络网中收到数百个集装箱的文物。在他占地6000平方米的仓库里，有30吨手写材料，100万张照片，10多万张毛时代的宣传海报和来自毛时代的黑胶唱片。²为了容纳他的收藏，樊建川决定，建博物馆，他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寻找灵感——他最喜欢的是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和靖国神社游就馆。³不过，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策展眼光，他将自己的博物馆聚落描述为一个“超市”，根据人们的日常需求提供精神和文化产品。与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历史博物馆不同，他按照材料和功能来安置文物，比如红色

¹ 关于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更多、更新的信息，请见：<http://www.jc-museum.cn/>（最近访问：2014年6月15日）

² 樊建川，《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象》（北京：三联，2013），第108-111页。

³ 与樊建川的访谈，2013年8月26日。

时代系列的前四座博物馆，它们分别用来专门收藏（1）瓷器，（2）日用品，（3）毛主席像章、钟表和印章，（4）镜子。红色时代日用品博物馆中陈列了文革期间“典型”的家庭住宅中的物品和家具——包括工人家、农民家、士兵家和干部家——以及图书馆、诊所、广播电台、摄影工作室和幼儿园。两个大展厅按类别陈列着其他日常物品：火柴、唱片、幻灯片、搪瓷杯、铅笔盒、乐器和收音机，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去个性化的，以唤起集体记忆，它们代表着社会类型，而不是个人。

这些展览通过一种海量装饰的美学来展示藏品的绝对巨量：将毛主席像章拼成四个巨大的毛像，用印章来铺就人行道，将钟表摆放成一个莹窟模样的墙壁展示，以及用镜子搭建了一座迷宫。其中一些设置有传递信息的特殊意图：“这些印章”，导游解释道，“曾经拥有能够控制人生死的权力，所以现在我们将它们踩在脚下，以表达我们的蔑视。”¹来自文革时期的112座钟表发出怪异的滴答声与报时声，钟表旁边则是一个用来展示文革期间暴力照片的圆形大厅（图11.1），它们被当作是警惕历史重演的“警钟”。红色年代系列的第五个、亦是最新的一座博物馆，是知青生活馆，它包含一个中央天井，里面摆满了破碎的、文革时期的镜子和生锈的农具，深刻地暗示了伴随群众运动而来的祛魅。



图 11.1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用来展示文革照片的圆形大厅（左），以及代表着历史“警钟”的钟表（右）。摄影：李洁。

¹ 樊建川，《建川博物馆解说词》，独立印刷书籍，2007，第108-117页。

“镜子”也是“历史”的代名词——以史为鉴——樊建川本人非常以他的红色年代镜面馆为傲。镜面馆包括一座白色的、朦胧不清的迷宫，不仅让许多游客眼花缭乱，陷入困境，也是在与监察人员玩捉迷藏的游戏。在最初策划的展览获得官方的批准之后，樊建川将之前的一间空屋子拿出来用来展示文革时期的“通缉令”，然后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用邻居和家人的忏悔和告发来填满另一座壁龛。在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中，他为电影演员冯喆的壁龛采取了同样的“游击战术”：1969年，冯喆在安仁自杀，樊建川是冯喆的资深影迷，他从冯喆健在的家庭成员那里收集了一些照片和文件，并且在博物馆的展览策划通过审查之后，为冯喆的回忆建造了一座小小的神殿。

这些未经批准的展览存在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2009年，我在人民公社食堂旁边看到了一个大跃进主题的室外照片展览。农业乌托邦的影像显然被篡改，同时还带有其原始的标题，对于任何对大饥荒略有所知的人来说，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讽刺意味。¹2013年，这个展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座红色年代博物馆中增加了新的玻璃橱窗，展示了一些政治敏感的文件：审讯记录，反革命口号清单，经济犯罪报告，红卫兵没收物品清单。这些“游击性质”的展览为樊建川接下来想建造的博物馆做好了准备。待官方批准之后，他的第六座红色时代博物馆将一年年地记录下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在樊建川的设想中，未来的博物馆将集中在更为禁忌的话题之上，比如大跃进饥荒、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和派系斗争。与此同时，他不断地调整开放博物馆的展品，用“更人性化、不那么理想化”的日常生活照取代宣传照片。²

2005年，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写了一篇题为《从文化产业到毛泽东产业》的文章，提到了仍然在计划建设中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乍一看上去，它只是对巴金庄重

¹ 关于大跃进时期对新闻摄影的操控，见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的审查制度，建川博物馆里大跃进的照片本可以用1958年至1962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一个关于粮票和当年人们为了生存而吃过的东西的展览来进行补充。

² 与樊建川的访谈。

且悲痛欲绝地发誓要悼念死难者的想法的一种荒谬的、讽刺的、拙劣的模仿，然而，事实证明，它是对极具传染力的塞壬之歌²¹的最佳解毒剂”，塞壬之歌，也就是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达顿认为，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以及毛泽东死后出版的传记都在继续具体化毛主席政治的“光环”特质。相比之下，“（安仁）文革博物馆的商品化拟象，通过怀念过去，通过将过去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提供给现代人，让过去在想象中无法成为一件可怕事件…在将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和毛泽东等人物转变为分散消费者注意力和怀旧情绪的形式的同时，这种商品形式剥夺了它们原有的变革能力。”²

尽管建川博物馆聚落拥有轻松而有趣的氛围，但事实证明，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化的主题公园。与巴金最初的愿景相比，它不那么具有对抗性，它展出毛泽东时代的文物，文字解释却很少，为公众记忆和多元解读开辟了空间。游客们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们童年时代的、令人喜爱的工艺品，又或者会想起“极左年代单调的精神生活”。³在撰写1980年代全球性的“记忆热潮”时，安德烈亚斯·休森（Andreas Huyssen）指出，“无论我们多么渴望，在商品文化之外没有纯粹的空间”，但是商品化也并不简单地意味着遗忘，而且，“记忆驱动也有着更有利的、更有生产力的维度”。⁴与位于艾森许滕斯塔特的“东德日常生活文献中心”类似，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展览创造了“一个哀悼的场所”，以及一片“共产主义安魂曲的舞台”。⁵在博物馆的目录中，将这些“红色收藏品”描述为被

¹ 译注：塞壬（Siren）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的女怪物，又被称为海妖或美人鸟。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写，塞壬女妖们居住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的一座遍地是白骨的岛屿上，她们用自己天籁般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

² 迈克尔·达顿，《从文化产业到毛泽东产业：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From Culture Industry to Mao Industry: A Greek Tragedy*），《边界 2》（*boundary 2*）32，第2期（2005），第165-166页。

³ 一个典型的游客评论，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687c870100ft3j.html（最近访问：2014年6月15日）

⁴ 安德烈亚斯·休森，《过去在当下：城市重写本与记忆政治》（*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第19-21页。

⁵ 查里蒂·斯克里布纳（Charity Scribner），《离开忧郁》（*Left Melancholy*），载《失落：哀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urning*），戴维·L·恩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303-305页。

厌倦了那个年代的人们丢弃的“弃儿”，所以博物馆可以被看作为它们的“坟墓”。同时，它还注意到了许多日常用品作为社会和心理控制的政治工具——比如，粮票的展览，旨在证明“计划经济的失败”。¹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陈列着中国最大规模的“红色文物”收藏，它是中国各地“红色收藏家”们举办的诸多红色纪念展览中最突出的案例——无论是在商店里，在红色主题餐厅中，还是其他向游客或消费者开放的空间里。2010年，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临时展中，我看到了展出的各种展品，包括毛主席像章，文革宣传海报，毛时代电影，粮票等等。正如哈丽特·埃文斯（Harriet Evans）在第3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红色纪念品，比如文革时代的海报，对于今天的、不同代际的中西方消费者来说，具有多样而模糊的吸引力，他们可能会通过怀旧和恶搞与图像产生互动。正如唐小兵在第4章中所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形象在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再挪用，借鉴了“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遗产来批判当下。无论红色纪念品的吸引力如何，它已经成为了当代艺术家和收藏家、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们的易销商品，因为他们为红色纪念品在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展览和消费创造了场合和空间。通过将“红色历史遗产”转变成旅游资产，位于上海郊区的枫泾“古镇”开发了人民公社总部的旧址，以及文革期间挖掘的一处防空洞，作为新的旅游景点。类似地，河南省遂平县自豪地展示了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大跃进以来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今天，此处“历史遗迹”展出了大量的照片和文件，证明了这个地方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但并没有提到随之而来的饥荒。²这些红色纪念品博物馆让参观者用自己的历史记忆来填补毛时代的阴影，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革命对生命的摧残。

纪念革命之生命代价

¹ 《中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独立印刷目录，2009，第78-130页。

² 一位博主贴出了这座前人民公社改成博物馆的最新照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0372e0101mhpe.html（最近访问：2014年6月20日）

不仅仅将毛泽东时代看作是一种文明，同时也将其看成一场灾难，并且纪念为毛泽东的乌托邦愿景而牺牲的生命，人们可能会转而寻找那些被流放的、消失的社区的废墟。毕竟，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导致了数千万人的非自愿移民，其中大部分是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从中心到边缘。除了流放和家庭分离带来的创伤，那些在毛时代的暴力中非自然死亡的受害者的幽灵也依然游荡在很多地方的上空。确实，有一些纪念场所，曾经是劳改营，集体农场或者是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失去生命的人们的集体墓地——在这些记忆场所，毛泽东主义政策形成的社区或者依然幸存，或者已经消亡。其中就包括甘肃的夹边沟劳改营，湖北的咸宁五七干校，重庆的红卫兵墓园，和广东的塔园文革博物馆。在适当的条件下，有可能将一些被毁坏的遗址变成纪念场所——主要是通过幸存者的纪念性警觉（commemorative vigilance）和地方官员的适度支持。

让我们从夹边沟开始，在这里，曾经有一座劳改营坐落在一段摇摇欲坠的长城旁。1957年至1961年期间，这里共收留右派约3000名，其中约有2500人死于大跃进饥荒。2002年，基于夹边沟幸存者采访的主题故事集出版，广受好评，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相关回忆录，以及2007年的一部纪录片和2010年王兵导演的一部故事片¹。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夹边沟”的名字总是与反右运动带来的创伤、大跃进饥荒、以及出于政治原因关押了数千万人的劳改制度联系在一起。²

今天，在夹边沟的原址之上，并没有建造任何博物馆或纪念物，如今的夹边沟是一片林场；只有少数寻找夹边沟遗址的人们才能看到它曾经作为劳改营的历史，一些访问者在

¹ 见杨显惠，《上海女人：来自一所中国劳改营的生存故事》（*Woman from Shanghai: Tales of Survival from a Chinese Labor Camp*），（纽约：万神殿书局，2009）；高尔泰，《寻找我的故乡：中国劳改营回忆录》（*In Search of My Homeland: A Memoir of a Chinese Labor Camp*），（纽约：伊珂出版社，2009）

² 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中国的刑事司法：一部历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第270页。

网上分享了他们的所见所感，或者拍摄的照片。¹在对夹边沟劳改营的毛时代受害者的纪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和凤鸣的故事，她也是王兵 2009 年拍摄的纪录片中的主角。和凤鸣的第一任丈夫被打成了右派，并被押送至夹边沟。1961 年，和凤鸣被允许前去探望丈夫，并带来了额外的口粮，但在到达夹边沟之后，人们告诉她，她的丈夫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去世了。她要求去看一看丈夫的坟茔，但却被拒绝了，于是她也无法在他的坟前进行祭奠。正如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三十年来，我们从未能在他的墓前浇上一杯祭奠的酒。残酷的政治迫使我们断绝了家庭关系。我很少在孩子们面前提到他，因为如果孩子们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同情，他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就很难站稳脚跟。”²一直到 1991 年，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和凤鸣终于找到了夹边沟的集体墓地。每一座坟茔之上，都摆放着一块来自戈壁沙漠的石头，上面用油漆写着死者的名字，并面朝下放置，以防被侵蚀。然而，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大多数名字已经褪色，无法辨认；和凤鸣翻找了几百块石头，却找不到丈夫的坟墓。实际上，后来和凤鸣了解到，直到 1979 年，即大规模死亡发生将近二十年后，彼时右派已经被平反，当地政府才在墓园内放置了这些刷上了名字的石头。他们采取这一措施是为遇难者家属的探视做准备，虽然他们知道这些名字可能与下面的遗体不符。³

¹ 以下的若干博客都是关于夹边沟的“游记”，图文并茂（最近访问均为：2014 年 6 月 17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e34d690102e1hs.html（2003 年前往）

<http://jqgsy.blog.163.com/blog/static/108926343200992651943803/>（2003 年前往）

<http://tsrb.gansudaily.com.cn/system/2007/07/30/010426537.shtml>（2007 年前往）

² 和凤鸣，《经历：我的 1957 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³ 和凤鸣的故事让人想起了西方传统中最古老的、关于记忆的故事之一。古希腊诗人西蒙尼戴斯（Simonides），西塞罗（Cicero）称其为“记忆的发明者”，曾经应邀前往一个贵族的宫殿参加宴会。宴会中，西蒙尼戴斯曾经走出了宫殿，就在此时，宫殿的天花板突然坍塌，遇难者的尸体被压碎，因此，亲属们根本无法辨认他们的身份。然而，幸存下来的西蒙尼戴斯，记起了宴会上每一个人所坐的位置，由是，遇难者的亲属们能够埋葬他们的亲人。见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第 1-2 页。

作为一种转喻和隐喻，和凤鸣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毛泽东时代，数百万人默默死去，却从未得到妥善的辨认或悼念。被随机放置在大片坟茔之上的、其上姓名已经斑驳的、迟来的“墓碑”深刻地表明，石质纪念碑取决于个人和社区的纪念活动，而这一点又依赖于政治合法性。“如果人们没有纪念的意图”，詹姆斯·扬（James Young）在谈到集中营的旧址时指出，“这些废墟不过是一片死气沉沉、毫无意义的景观，并不具备我们在参观它们时所创造的价值和意义。”¹尽管姗姗来迟，和凤鸣和其它的夹边沟幸存者们的记忆终于被写下、被呈现在电影之中，从而开启了一场纪念性警惕，从此之后，劳改营的废墟变成了一座没有标记的纪念碑。夹边沟林场继续接待来此的访客，他们在此祭奠、悼念。为了这些访客，当地政府对夹边沟原址采取了保护措施，用铁丝网包围住废墟，并用水泥板铺路。²

夹边沟变成了一个记忆场所，体现了人们对重新游览那些曾经被放逐、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社区的兴趣。除了1000万劳改犯之外，在1965年到1979年期间，大约1700万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在文革后期，数百万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³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流放的地点是集体农场，在这些农场中，组织与荒野、纪律与自由、残酷和友谊彼此交织在一起。大多数被驱逐的人最终都返回了家园，但有些人没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将永远被放逐，这一假设让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回忆充满了绝望、悲伤，以及自愿或非自愿牺牲的神圣性。

这种对自己的过去的“游览”也激发了人们创造出更多永久性的记忆形式。正如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用镜头所记录的那样，位于云南的弥勒东风农场，在1950年代末曾经是一座劳改营，关押了大约400位右派分子，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又接收了大

¹ 詹姆斯·扬，《记忆的本质》（*The Texture of Memory*），（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第119页。

² 参见前面引用的旅游博客。

³ 彭轸（Frank N. Pieke）、莫雷（Hein Mallee）编，《境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中国视角》（*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英国，里士满，萨里郡：寇松出版社，1999），第41-42页。

量的知青。这部纪录片创造了弥勒东风农场的一种“重写”方式，以前农场成员的“诉苦”口述历史开始，最后以一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念雕像的建造作为结束，这座雕像将右派分子和知识青年们描绘为将荒原变成农田的开拓者，而不是被流放的受害者。¹类似地，从不幸的受害者的苦难经历到英雄主义牺牲的转换，或者升华，也奠定了黑河知青博物馆的主要基调，这座博物馆于2009年秋季开放，它和其它的知青纪念场所，无一不倾向于呼应而不是批判将知青们送往“北大荒”的意识形态。²

将受害者变成英雄和殉道者，对于纪念毛时代所牺牲的生命来说，并不是一种罕见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创伤与死亡的意义被扭转了180度角，从废弃到牺牲，从否定到肯定，从控诉到光荣，从合法性丧失到神圣化。在革命意识形态夺走了人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之后，它还在继续篡夺人们死亡的意义吗？如果人们真的相信毛泽东主义的理想，并且希望他们的牺牲能够带有一个更宏伟目标的光环，那么有必要指责这种信念其实是洗脑或者虚假意识的后果吗？

能够体现将来自过去的黑暗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源甚至象征性的资本之艺术、政治和伦理的最佳案例，或许是湖北省咸宁市的五七干校旧址，从1969年到1974年，它在艰苦的条件下关押了来自北京文化部的6000多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沈从文和冰心。1990年代中期，咸宁的当地官员李城外在县志上重新发现了这块地方遗产，他决定挖掘自己看到的这片“文化金矿”。从那时起，李城外收集了大量曾经在咸宁五七干校生活过的“文化名人”的书籍、文件和口述历史，与前五七干校成员和文学史学家召开了若干次会议，并在原干校旧址上建造了一座小型博物馆，展出相关的照片和文物。³在通过

¹ 胡杰，《国营东风农场》，2009。

² 视频形式的博物馆虚拟之旅，参见：<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slRcj8b5JI/?fr=rec1>（最近访问：2014年6月17日）

³ 2013年1月，李城外非常友好地带领我参观该景点，并且向我展示了他的收藏品。关于该场所的最新进展，请访问李城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wcltzw>（最近访问：2014年6月15日）

大众媒体宣传其历史的同时，李城外也敦促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为未来的旅游业做出更多的保护措施，并且进一步开发这一“文化资源”。¹批评者讽刺地质疑，在这片“文化废墟”之上，究竟有什么可以“收获”，同时谴责该旧址的开发者们正在“兜售一段可耻的历史”，这必然会把粉饰的抒情主义运用到残酷的现实之中。李城外援引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设想，坚定地为自己的努力辩护，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拯救历史避免被遗忘，并且重振中国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精神。²到目前为止，咸宁五七干校的纪念活动并没有获得多少政治或经济上的投资，但不断增加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使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之地而声名远扬。

除了参观被放逐的社区的旧址，人们还可以通过游览在毛时代死亡的受害者坟墓来反思文革的人身代价，比如刘少奇墓、老舍墓、林昭墓，或者像重庆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墓地里，埋葬着普通人的乱葬坑。红卫兵墓园中的乱葬坑是今天仅存的一个埋葬着在文革时期的派系暴力中死去的普通人的墓地。由于军火工厂集中在此地，重庆成为了受文革暴力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与夹边沟的乱葬岗不同，在重庆红卫兵墓地中，不但埋葬着不幸的、遭受国家压迫的受害者，也埋葬着积极参与暴力活动的人们。他们的遇难可以被类比为在一场没有明显“对”与“错”的双方的内战中牺牲的士兵，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以捍卫毛主席的名义死去的。墓园中的墓碑通常是按照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风格建造的方尖碑，上面有宏伟的毛式书法碑文，称死者为“革命烈士”。然而，四十年的荒废和侵蚀，即使是最宏伟的纪念碑也变成了破旧的废墟，许多碑文难以辨认。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在原址的破坏状态和奇迹般的存在之间的不协调，让这片墓园成为了前来祭奠的死难

¹ 一份关于这座前五七干校截止 2009 年的情况的深度新闻报道，见钟刚，《向阳湖五七干校漫长的开发之路》，《南方都市报》，2009 年 4 月 26 日，见：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09-04/26/content_771431.htm（最近访问：2014 年 6 月 14 日）

² 关于种种争论，见李城外编，《向阳湖文化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第 338-378 页。

者亲属和偶然到来的访问者的一个强有力的记忆场所，有些人试图确认埋在那里的人的身份，并记录他们是如何死亡的。¹



这座墓园之所以依然存在，我们不仅仅要感谢来访者们的纪念活动，还要感谢 1980 年代的重庆市党委书记廖伯康，他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迫害。1985 年，面对保护或拆除墓地的决定，廖伯康拨款在墓地周围筑起了一堵墙，并下令将其关闭，直到 1990 年代末才对公众开放。²正如张跃宏在其详实的历史与民族志分析中所记录的，该墓地的丧祭活动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60 年代末，在派系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埋葬在那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因他们的“革命牺牲”而受到赞颂。到了后毛泽东的改革时代，当文革被官方否定之后，红卫兵被诬蔑为犯罪分子，悼念他们也成为非法行为，埋葬在此地的红卫兵“死后又被宣判死刑”。自从 2000 年以来，随着清明节扫墓风俗的复兴，死难者亲属们纷纷回到此处进行私人悼念，沙坪坝公园的管理部门为每一座坟茔拍摄了照片，并且收集了相关的历史记录和口述历史作为档案留存，甚至在 2009 年，红卫兵墓园成为了官方命名的、受保护

¹ 潘公凯，《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Out of Mao's Shadow: Ti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2008），第 81-112 页。

² 同上，第 110 页。

的文化遗址。官方的命名让悼念者的出现合法化，他们在墓园里公开争吵，并且留下涂鸦以表达他们对死亡和文革本身相互矛盾的理解：一些人认为，红卫兵们年轻的生命因为他们对毛泽东的盲目信仰而被浪费了，在他们看来，红卫兵墓地的存在，如同巴金的警告一样，只为了不要让历史重演；另外一些人则希望肯定文革，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和腐败的批判。由于担心引发社会动荡，公园管理部门关闭了墓地，现在只允许死难者家属在清明节期间进入。¹

2013年8月，我有幸参观了红卫兵墓地，一位退休的公园管理者——他是我的一位家族世交的儿时旧友——为我暂时地打开了墓地的大门。在簇叶从生的杂草和蚊子中，一些坟茔前还摆放着最近的扫墓者留下的痕迹：水果与鲜花，烈酒与香烟，焚香与纸钱，以及褪色的铭文之上新刷的红色痕迹。漫步在这片令人印象深刻的废墟之上，我能听到墓地围墙之外有退休人员在合唱文革歌曲，但我不知道这歌声是出于记忆还是源于失忆。²

由于墓地是共识性的公共纪念场所，所以第一个以“文革博物馆”命名的纪念场所落于派系斗争的牺牲者所在的墓园也是有道理的。1996年，广东省汕头市的一位退休的副市长彭启安，偶然在汕头北郊的塔山风景区发现了几十座杂乱无章的坟墓。在得知这里埋



葬着在文革期间死于派系斗争的遇难者之后，彭启安构想了一座纪念公园来纪念那段历史，他带领着他的老同事们开始了一个名为“塔园”的项目。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彭启安筹集资金建造了一系列中国传统纪念风格的户外纪念馆，包括“碑廊铭史”，“思安塔”，以及“警钟长鸣亭”。2003年，一位朋友

（汕头塔园的入口，李洁摄）送给他一本杨克林的《文革博物馆》，两年后，彭启安将这座“纸

¹ 埃弗雷特·Y·张 (Everett Y. Zhang), 《在重庆红卫兵墓哀悼：以生命的名义》(Grieving at Chongqing's Red Guard Graveyard: In the Name of Life Itself), 《中国期刊》(China Journal) 70 (2013), 第24-47页。

² 另见爱德华·黄 (Edward Wong), 《重新包装中国革命经典》(Repackaging the Revolutionary Classics of China), 《纽约时报》, 2011年6月29日。

上博物馆”变成了“石上博物馆”。他委托建造了一座类似北京天坛的圆形建筑，入口处设有巴金的肖像和书法（图 11.3），在建筑的内墙上，是数百块灰色花岗岩，其上刻有杨克林书中的内容，大多数是群众集会的照片和死亡的画像。博物馆还在玻璃橱窗里展示了一些红卫兵臂章、红宝书、毛半身像和徽章，但由于缺乏安保人员，一些文物被盗走，于是展览被撤销。¹

随着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的到来，第一个以“文革博物馆”命名的纪念场所受到了国内外媒体以及中央政府的广泛关注。彭启安原本希望将他的塔园建设成一个“反思教育



基地”，类似“爱国教育基地”，他请求到访过塔园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留下他们的书法样本。³

然而，政府当局总是避开该景点，不鼓励媒体宣传，并将塔园排除在当地旅游行程之外。尽管如此，自从

2006年以来，彭启安和一些年轻的志愿者们每年都会（汕头塔园内的安息园，李洁摄）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以哀悼“文革所宣称的、丧生的 2000 万人的生命”——这个众所周知的估计数字来自 1978 年的叶剑英元帅口中，但是学者们对此嗤之以鼻——为此，他们建造了一个特别的“安息园”，园内中心设置了一座刘少奇的雕像，围墙上则刻满了成千上万。位受害者的名字。⁴

迄今为止，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博物馆”，而不是“收藏家的博物馆”，汕头的塔园因此在官方审查的缝隙之间幸存了下来。塔园的石刻碑文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该为文化大

¹ 柯培忠编，《汕头澄海塔园文革博物馆资料集之一》，独立印刷书籍，2006年，第246-253页，一位游客在博客上上传了汕头塔园博物馆的虚拟游览，见：http://stfmlx.blog.hexun.com/36508393_d.html（最近访问：2014年6月20日）

³ 《塔园动态》，独立印刷书籍，2012年。

⁴ 关于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数的各种学术估计，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的大规模杀戮年表》（*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在线集体暴力百科全书”，见 <http://www.massviolence.org/Chronology-of-Mass-Killings-during-the-Chinese-Cultural>, August 25, 2011（最近访问：2014年6月28日）

革命和其他灾难性的群众运动负责，但这种大胆的言论在缺乏听众的情况下，听起来也可能是很空洞的。塔院的通讯稿声称，该景点每年会接待 20 万至 30 万游客，但是 2013 年夏天我在参观这里的时候，只遇到了另外两名游客。管理这座公园的当地居民把这座文化大革命纪念馆比作一个发育迟缓但尚未被当权者勒死的孩子。虽然得到了一些年轻的志愿者的帮助，但年迈的创始人彭启安仍然需要找到一位具有足够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合格继任者，以帮助塔园在未来蓬勃发展。除了将历史记忆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该博物馆还劝诫人们记住历史，并且展示了在对抗国家主导的遗忘的情况下，纪念毛时代的人身代偿的可能性。

他者的记忆：给策展人的建议——“绊脚石”¹

想象一下，对于毛时代的每一次非自然死亡，死者家属都可以在其死亡地点或者靠近其故居的地方的人行道上，嵌入一块石头，石头不超过一英尺大小，上面铭刻着死者的姓名、出生与死亡的日期，或者是一张照片，以及一两行关于死亡原因的说明。这块石头可能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在上海的休闲新区、在小城镇的主要街道上，有着上百块，甚至上千块这样的石头——就像近年来各地重新出现的各种门神、财神和土地神一样无处不在——然而，每一块不起眼的石头都为警惕性记忆增加了一份重量。或许它也不一定是石头；标记物也可以是一座座迷你寺庙；又或许它们只能出现在清明时分的哀悼之中，以闪烁的光芒表明了对死者生前人生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死于不公正和暴力的人们。被冤枉的鬼魂可以被奉为历史的小散仙。

当我漫步在德国繁忙的都市中心与人烟稀少的小城镇的人行道上之时，我无数次踏过这种被称为“绊脚石”的石头，它们仿佛一块块迷你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让我产生了以

¹ 译注：绊脚石（英语：Stumbling stones；德语：Stolpersteine），是由德国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所谓“绊脚石”，是棱长 10 厘米的立方体混凝土块，其中一面贴嵌了一块镌刻着专门纪念文字的黄铜板。这个艺术项目的目的是纪念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被纳粹政府谋杀、驱逐和逼迫自杀的人。通常，绊脚石铺设在受难者生前住所门前的路面上，与普通的铺路石平齐。目前，已经有 55000 块绊脚石被铺设在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

上的幻想。每一块石头都由一位名为冈特·德姆尼希的艺术家亲手制作，这些石头上的文字都以“在这里曾经生活着”开头，然后是死者的姓名，出生年份、地点和死亡年份。这些石头毫不起眼，但却如同骨鲠在喉，它们直接在死者生前最后的自愿居住地门前纪念那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德姆尼希于2006年启动了“绊脚石”项目，截止2014年，他已经铺设了超过45000块石头，不仅仅在德国，也在德国附近的国家，从荷兰到匈牙利。大部分石头的制作是由私人赞助的，每块石头的制作和安装大约在100欧元左右。捐赠者必须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在这些石头被铺设之后，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它们更深层次的兴趣，从而引起人们对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学校的课堂之上。¹

在任何纪念性的方尖碑或者大型博物馆之外，我发现“绊脚石”是中国未来的纪念碑的一种令人振奋的新范式，它们旨在承认受害者生前所遭遇的不公正，因为“绊脚石”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并不以将其转移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为前提，也因为每一块石头都可以激发人们在自己的邻里街区之中，对这些名字产生更深入的兴趣。尽管有争议的历史解读可能无法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共识，但地方政府在为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建立记忆场所的方面可以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这些场所不太显眼。毕竟，除了天安门广场之外，中国有着更辽阔的文化与地理景观，能够容忍更多的声音和记忆。此外，由于“绊脚石”的尺寸很小，成本也很低，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发起这一项纪念活动，而无需筹集巨额资金或向中央政府申请批准。因此，我对“绊脚石”纪念范式的倡导，源于它的代表性和解释的多元性，并且与它在当地社区的具体情况有关，与全国上下数百万的统计数据相比，在当地社区，历史事实更容易被查明。

¹ 莫妮卡·理查兹 (Monika Richarz)，《绊脚石：德国街道上的犹太大屠杀记忆标记》(*Stumbling Stones: Marks of Holocaust Memory on German Streets*)，载《调和现代性：犹太人与现代世界相遇中的挑战和趋势》(*Mediating Modernity: Challenges and Trends in the Jewish Encounter with the Modern World*)，劳伦·施特劳斯 (Lauren Strauss)、迈克尔·布伦纳 (Michael Brenner) 编 (底特律：维恩州立大学出版社，2008)，第325-338页。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特定的纪念碑——与那些将个体的苦难囊括到更广泛的、国家层面的悲剧下的纪念碑相对——可能会分裂而不是团结社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绊脚石”会将后文革时代的考察转向个人悲剧的层面，由此产生的新伤口可能会助长对报复性正义的危险渴望。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政治形式的哀悼也可能在没有压制的情况下实现和解。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任何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纪念这些受害者的纪念物、牌匾或标志都会被迅速移除。然而，如果重庆红卫兵公墓和汕头塔园博物馆能够得以保留，人们可能会猜测，官方记忆和非官方记忆之间的谈判或许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拟修建的纪念物的内容、形式、地点和时间。最后，那些坚持必须强调在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和农民所遭受的苦难的人们，也可以使用“绊脚石”的模式来提醒我们来自“前革命时代”或者“后革命时代”的残酷行为。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受害者。

重新整理毛主义遗迹

正如重庆的红卫兵墓地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保护一样，毛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比如褪色的标语、墙上的绘画等等，也可以被保存和添加注解，从而通过突出一个地方性的考古层次来增强历史意识。考虑到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毛时代遗迹的旅游价值，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可能会在每一个新建筑的设计中允许在其墙壁上留下一些碎片或历史痕迹。这并不是完美的修复，即使是肉眼可见的文物损毁，或者文革中被摧毁的“四旧”，都可以作为那段历史的深刻见证。如果新的建筑设计无法兼容旧的废墟，人们可以在拆毁旧建筑之前拍下照片，然后在原址附近展出这些照片。

当代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利用来自毛时代的、被遗忘的物品和遗迹，通过修复（remediation）和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把它们变成了纪念品。在“墙上的毛主席”系列中，王彤在河南农村拍摄了上百幅褪色的毛泽东肖像。电影制片人王兵、贾樟

柯和张猛都以社会主义工业的废墟为背景，在它们被最终拆除之前，拍摄出了他们备受赞誉的电影，比如《铁西区》（2003），《二十四城记》（2008），和《钢的琴》（2011）。在他的作品《物尽其用》中，艺术家宋东将他母亲家中的所有东西——从旧鞋子到牙刷架，所有东西都被不加区别的囤积着，其中许多日常用品都是毛泽东时代的遗物——整个搬到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借用斯维特拉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对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在一家家居画廊里对苏联日常生活的再现的评论，宋东的收藏“就像诺亚方舟，只是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位艺术家逃离的是地狱还是天堂。”¹

虽然中国艺术家们通过各种媒体展现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和个人记忆，但是在中国的先鋒派艺术界，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纪念艺术**的缺失，公共纪念艺术被认为是参观者与过去的一种相遇的体现，作品不仅仅是物体本身，而是艺术、空间、时间和观众之间的一系列关系。²与流行艺术或者大众艺术不同的是，当代公共艺术“并不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可以被娱乐或被指导的普通观众群体，而是通过一种审美互动的方式来塑造一个特定的公众。”³公众艺术的政治敏感性——比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期间创作的作品“民主女神”——可能是导致这种缺席的原因之一，然而城市规划者、历史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教育工作者还可能在公共纪念项目上进行合作，这些项目将“萦绕于”失忆的景观，并帮助人们厘清现有的记忆。

当代艺术家和策展人成功地在画廊、剧院和电影院中保有了私人艺术的飞地。在这样的空间里，展览可以围绕一个特定的历史主题进行，而不是围绕一群艺术家。例如，人们可以举办钢铁主题的展览，包括旧的宣传海报，一个家庭炼钢炉的遗迹或者通过收集家用

¹ 斯维特拉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纽约：基本图书公司，2001），第311页。

² 姜节泓，《负担或遗产：从中国文革到当代艺术》（*Burden or Legacy: From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ontemporary Art*），（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

³ 希尔德·海因（Hilde Hein），《公共艺术：另一种思考博物馆的方式》（*Public Art: Thinking Museums Differently*），（马里兰州拉纳姆：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6），第49页。

铁制品来重现“炼钢”的过程，介绍钢铁产业和钢铁工人的生活，以及其他有关中国钢铁生产的历史资料。这样一个项目，与其他更多的特定场所的展览一样，涉及到档案研究，想象力和进取精神，可能会涉及到大学生与私人艺术画廊之间的合作。

除了艺术和教育空间，公众记忆的形成也可以出现在商品化的空间中，比如毛泽东时代的纪念品市场、红色主题餐厅，以及一些特定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所谓“红色”，往往指的是毛泽东时代，而不是1949年以前的革命历史。更多的策展人可能会考虑将其商业潜能和干扰能力与一些历史和教育的内容结合起来，而不是将红色怀旧和刻奇产业视为失忆症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个场所恰好吸引了那些试图寻找自己的过去的访客们，那么我们可以设立一个记忆分享角落，鼓励人们以文字或照片的形式留下自己的记忆。这意味着，呈现历史的方式，超越了历史学家的视角，与访客们共享解读的工作；例如，一个展览可能会将每件文物与前主人的记忆笔记或口述历史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所收集的物品的意义去个人化。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人们还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在社区里和其他地方制作视听之旅，融入当地的口述历史，以唤起对消失社区的回忆。

赤脚历史学家：

改造毛时代的实践，深入挖掘始于足下

正如阎云翔在他对中国东北某村庄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初的去集体化，通过会议和党领导的组织、集体劳动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活动——比如乡村表演团体和帮助老人的志愿者组织，加快了政治参与和社会化的消亡。随着集体空间被破坏，村民的大部分休闲时间都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或麻将桌前度过的，这导致了“公共生活的衰落”。当然，在毛时代，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并不完全是自愿的，“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产生的那种社会性，不可避免地带有党国主义官方意识形态

的印记。”¹然而，那些在成长过程中习惯了这种公共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都开始非常地怀念它，比如，在中国各地的公园里，中老年人唱着毛时代的红色歌曲，这一现象随处可见——对巴金来说，这可能是噩梦般的景象和声音，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失忆症的特征。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建议，将毛时代的一些公共文化实践，改造成“积极的”遗产，以策划公共的、社区的记忆工作——具体而言，包括将“诉苦”改造为代际对话，将毛“深入群众”的号召改造为对“赤脚历史学家”的鼓励，将移动电影放映改造为地区性的本土电影。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都在调查和编纂地方性的阶级斗争案例，并为私人历史的公开表述提供了舞台——这些表述总是被塑造成“解放前的苦对比解放后的甜”这种公式化的叙述。“诉苦”在土改时期初登历史舞台，用来控诉地主的“罪恶”；到了1960年代中期，它成为了一种将阶级仇恨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手段。毛泽东去世后，伤痕文学和口述史合集——比如冯骥才编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也给文革受害者提供了“诉苦”的机会。近十年来，随着数字视频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电影人制作了许多以口述历史为基础的电影，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彼此争夺观众的中国电视节目，则生动地展现了毛时代的苦难与生存的见证。除了这些口述历史的内容，老一辈把他们的故事传递给下一代的做法，可能是“诉苦”值得传承的一个方面。为了鼓励这种代际对话，教师和大众媒体可以发起征文比赛或视频制作比赛，让年轻人记录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虽然“获奖作品”的出版或展览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自我）审查，但这仍然可能为原本患有“失忆症”的年轻一代提供一些历史意识。

我们可以创造性地改造的另一项毛主义的遗产是鼓励业余主义和基层活动，以促进社区之间的记忆工作。在大跃进、四清运动和文革期间，许多普通民众，包括农民，工人和

¹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第232-350页。

学生，用大字报，壁画，演出和其它形式的革命宣传活动填满了公共空间，有时也会用从“阶级敌人”那里没收来的文物来举办关于阶级斗争的展览，比如上文提到的安仁地主庄园。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数以万计的移动放映团队将电影带到农村群众之间，并以手工制作的、关于当地英雄的幻灯片作为电影节目的补充，同时配有现场的口述故事。虽然这类展览和表演往往是捏造的，并且可以作为革命暴力的催化剂，但是让基层群众重新参与到地方历史的策划工作中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或许可以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人民的历史”或“深入挖掘始于足下”等格言指导下兴起的、来自西欧的地方历史研讨会中汲取另类的灵感。在工作过程中，不仅有学术史学家，还有“赤脚历史学家”，他们对恢复被遗忘的边缘群体（如农民和工人）的历史很感兴趣。

一个“赤脚历史学家”项目的典型案例，是由独立记录片制作人吴文光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发起的。自从2010年以来，“民间记忆纪录片计划”派出了若干年轻的电影人前往农村，向老年人询问有关大跃进饥荒的情况。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找回和传递正在消亡的记忆的历程。在影片《罗家屋：我和任定齐》（2011）中，罗兵试图从他的邻居任爷爷那里寻找一段难以捉摸的回忆，同时用画外音的方式思考这些记忆的意义。任爷爷向罗兵介绍了大饥荒的其他幸存者，他们的证词断断续续地、通常还没有进入正题就被他们的成年后人尖声地打断。在影片《吃饱的村子》（2011）中，尽管遭到来自家人的强烈反对，邹雪平还是召集了她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们观看她收集的关于饥荒的视频证据，并一起讨论这些影片是否能够在海外放映。在她的下一部影片《孩子的村子》（2012）中，邹雪平动员全村的孩子们筹集资金，并且收集村里的大饥荒受害者的姓名和背景，为他们竖立了一块墓碑和纪念碑。¹“民间记忆纪录片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档案收集计划——事实上，这个计划的学术历史价值还有待商榷——但是，每一位年轻的电影人或者赤脚历史学家都

¹ 关于“民间记忆计划”的更详细的描述，见庄佳云（音），《饥饿记忆与重现》（*Remembering and Reenacting Hunger*），《戏剧评论》（*The Drama Review*）58，第1期（2014），P221。

试图开展了一场（往往是治疗性的）讨论，探讨关于他或者她所在的村庄曾经发生的创伤往事，如果不是这些人的努力，这些讨论也不会发生。

结 论

在2006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48名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建造官方的文革博物馆的提案。该提案援引巴金的倡议，对围绕着文革的失忆症及其不严肃的神秘化表示担忧，呼吁放松对研究和出版的审查，并建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为未来的博物馆收集材料。不出所料，这项提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¹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北京建造一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纪念性博物馆的希望依然渺茫，但国家强制的失忆症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在企业家和收藏家、开明的地方官员和各种幸存者团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记忆既不需要由当前的政治权威主宰，也不需要被隐藏在日渐衰落的私人生活中。

事实上，比任何中央纪念博物馆更加有效的，是个体之间的基层倡议，这些倡议旨在自我教育和让个体所在的社区了解他们的国家、地区和公共历史的各个层面。最好的纪念博物馆不应该规定如何在博物馆中再现毛时代，不应该宣称掌握了关于过去的权威真相，而应该鼓励和让人们发现属于他们自己的、复杂的历史。当地历史组织可以与当地博物馆合作，开展研究和举办展览，收集口述历史，申请历史保护，创建或委托公共艺术或纪念物，启动和运行城市的历史旅游，编辑时事通讯和杂志，并为学校教师提供教学资源。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往往囿于幸存者群体之中，很少跨越代际界限。²出于这个原因，现存的记忆场所很少能促进群体间的对话，从而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创伤与更大的民族认同融合起来。除了偶尔的劳工抗议或上访活动外，工人和农民的记忆很少在公开场合被表达出来，

¹ 该提案名为《反思历史，创造条件，筹建文革博物馆》，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8ee85010009q1.html（最近访问：2014年6月14日）

² 苏珊娜·魏格琳-施威德齐克，《寻找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导叙事》（*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中国季刊》188（2006），第1089页。

而在回忆录和其他媒体中，往往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前红卫兵和知青们在讲述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痛苦和幻灭的故事。增进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和为自己的同谋行为忏悔，需要适当的场所和场合。在中国，没有类似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但是，民间社会可以创造更温和的替代过程。创造更有成效的、更有技巧性的记忆场所将会抵消某种倾向，即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受害经历的同时，也指出了那些有罪的个体。想一想在中国的寺庙和圣殿中，最受欢迎的场所，往往是写下祈祷并将它们悬挂在“许愿树”上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在重庆的红卫兵墓地，有一棵“赎罪树”或“真相与和解的花园”，在那里，那些内心有愧的人们可以匿名写下忏悔的纸条。为了弥补“无产阶级记忆”的不足问题，知识分子和曾经被下放的知识青年可以尝试将农民们的“他者”经验纳入任何致力于自身经验的纪念项目中。

鉴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愿打破对其创伤历史的禁忌，希望在多个公共纪念场所分享、了解和调和毛泽东时代的不同记忆，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尽管如此，让我们将巴金的遗愿向前推进一步，纪念物和博物馆不应该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官方表述，而应该是对过去回顾的一个公共过程的结果。当然，正如苏珊娜·魏格琳-施威德齐克（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所指出的，“关于谁的文革记忆能够在整体评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争论”，“与尊重无关”，而“与权力相关”。¹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加上詹姆斯·扬的见解：“记忆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记忆的动机从来都不单纯。”²诚然，当代政治和经济对记忆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今天的中国，公众和集体缅怀被官方压制的历史的场所还可以有更多——这些地方追求的是**策略性**而非**政治性**。除了能够为历史事实提供开放性的解释之外，优质的记忆场所还应该“忠实于那些应该被记住的、可以被合法地遗忘的、以及可能被宽宥的。”³

¹ 同上，第1091页；另见高默波，《为中国的过去而战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季刊》195（2008），第691-718页。

² 扬，《记忆的本质》，第2页。

³ 这个表述借鉴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记忆、历史、遗忘》（*Memory, History,*

【域外之音】

法国艺术家为纪念纳粹受难者 在斯格拉斯堡铺设第一批绊脚石

林 洛

据法国新闻广播电台网站（Franceinfo）五月一日报道，第一批 20 块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受害者的绊脚石于五月一日铺设在了斯格拉斯堡的人行道上。法国下莱茵议会议员蒂埃里·米歇尔(Thierry Michels)在他的推特上发布了现场铺设绊脚石的照片：四条边有 10 厘米见方的黄铜的绊脚石刚刚的嵌入斯格拉斯堡克莱蒙梭大道 19 号入口大门的左侧。



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在米泰索尔斯、埃尔利塞姆和斯格拉斯堡，德国艺术

Forgetting) 一书的书评：《历史罪恶感？保罗·利科的“长时程”》（*Guilty of History? The Longue Durée of Paul Ricoeur*），《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46（2007年5月），第238页；在原文中强调。

家冈特·德姆尼希（Guntner Demnig）第八万次重复了这个行动。绊脚石使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在其生活过的地方得以重生。犹太教堂举办了感人的纪念仪式，今日圆满结束。”¹

每一块绊脚石都是二战中一个陨落的生命：“这里曾居住着 Lucie Brunschwig，她 1892 年出生于 Meyer，1944 年被驱逐出法国，关入奥斯威辛集中营，1944 年 5 月 20 日被杀害。”

（见下图右上角的绊脚石）



斯格拉斯堡绊脚石协会主席 Fabienne Regard 说，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为 850 名曾生活在斯格拉斯堡却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每个人都铺设一块绊脚石。该市的市长说，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重新唤起公众的记忆，而不是让这段记忆沉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消息来源：[https://](https://www.francetvinfo.fr/culture/patrimoine/histoire/a-strasbourg-des-premiers-paves-scelles-au-sol-en-memoire-des-victimes-du-nazisme-3423987.html)

www.francetvinfo.fr/culture/patrimoine/histoire/a-strasbourg-des-premiers-paves-scelles-au-sol-en-memoire-des-victimes-du-nazisme-3423987.html

¹ 两张图片及文字摘自 Thierry Michels 2019 年 5 月 1 日发表的推文 <https://twitter.com/ThierryMichels>

题。如果试图对全国的文革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应包括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否则就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对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进行全面论述，会有难以深入的问题。在研究中很难做到既涵盖全国各地的详细情况，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一对矛盾，很难同时兼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是抽样。该书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解决可靠性和样本大小之间的矛盾。

《运动》对省市自治区的分类，采用3个方面的客观指标共计10个变量：（1）经济、人口、政治、地理方面；（2）局势稳定性方面；（3）群众运动发展方面。由此得到了7个类别：北京和上海属第一类，即中央直控类。第二类是群众运动发展较成熟的省类，共有14个省，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第三类是早期造反类，有6个省，如黑龙江和内蒙。虽然这些省的革委会成立得较早，但是它们并不安定，反复较大。第四类是边远地区类，共有4个省，如云南和西藏。此类省在全国的地位并不太重要。第五类是特异类，即中央间接控制的天津直辖市。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其他省不尽相同。虽然中央文革对天津的控制不如对北京和上海那么直接，但是陈伯达和江青等人能够直接干预。这些情况使得天津既有别于其他省，又有别于北京和上海。第六类也是特异类，只有青海省。这是由该省的特殊性造成的。青海省以其“二·二三事件”闻名全国。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依靠军区内多数军人的支持，通过非正常途径整倒并扣押省军区司令，并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开枪。第七类也是特异类，只有新疆一个省。新疆的文革以首府乌鲁木齐和建设兵团为两个中心，这在全国罕见。《运动》一书从以上7类省份中挑选12个省进行了分析。虽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省，但可以较全面地代表全国的文革情况。

作者对民众在文革中为什么参加群众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自2017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收集到了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按当时的行政划分）的1670名有效的受访者回答。问卷调查共有10个问题：（1）文革开始时所在地（省、市）；（2）出生年份；（3）性别；（4）家庭出身；（5）政治面貌；（6）职业；（7）参加群众组织情况（多选）；（8）群众组织属于社会哪一大派；（9）

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10）是否因参加群众组织受到审查和迫害。

研究发现，关于民众为什么参加文革，有两个突出的原因：一是响应毛的号召，二是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自身的处境。在响应毛的号召方面，革干革军子弟尤其多。工农子弟、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依次递减。在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方面，是按相反方向依次递增。这两个原因看似不同，实质上却是一回事，即都与自身的处境有关。作为红五类子弟，他们只要听从党和毛的号召，前途是有保障的。响应毛的号召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与红五类子弟的前途密切相关。而争取改变处境对于非红五类子弟来说，是非常实际的目标。文革前的17年里，中共执行的阶级路线，把灰五类和黑五类划为二等公民。他们在升学、就业、提干、事业发展和生活等各方面受尽歧视。文革的发动，使他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他们带着这一目的积极投入文革，希望能在文革中打个“翻身仗”。

响应毛的号召是红五类子弟的一种积极防守性的动因，目标是保住他们已有的特权和利益。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则是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的一种积极进攻性的动因，旨在争取夺得自己以前所没有的权力和利益。两个动因从不同的侧面展现相同的动机，事实上是殊途同归。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无形中分裂成为两大阵营：红色阵营和非红色阵营。无论民众参加的是哪个派别，他们都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而战，或者为了保持自身的处境而争。文革事实上是一场博弈，是以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与挑战现状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为主，以同为造反派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冲突为辅的博弈。

根据推算，文革中大城市里的民众参加群众组织的比例在53%~67%之间。在非省会地区，民众的积极略低一些，在43%~57%之间。农民参加群众组织的积极性最低，约占28%。

当人们谈论文革的群众组织或派别时，常会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词，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最常见的两个类别。尽管以前对群众组织的派别有不少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全国各省级群众组织进行系统的分类。《运动》一书对全国77个省级的大派群众组织进行了定量分类分析。省级大派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保守派、温和派

和激进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同属于造反派，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而已。

根据对各省大派组织的分类，该书对各省的文革也进行了分类。有的省份主要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即“阶级性派别”的冲突。有的省份是分裂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即“派性派别”之争。也有少数省是造反派“一家天下”，局势基本上由一个造反派别控制。各省的文革进展情况，有许多不同。我们在分析民众参加不同派别的动机时，应该注意上述两类派别斗争的区别。

这样的分类有助于理解西方学者两个学派的争论。西方有学者认为，群众组织的分派与家庭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冲突派”。但是也有西方学者发现派别与家庭出身无关，认为派别与斗争过程有关。这派学者被称为“政治过程派”。以上两派观点分歧的根源在哪里？与家庭出身无关的派别之争，通常是同一造反阵营里的不同派别之争，即“派性派别”；与家庭出身有关的红卫兵之斗，则是不同阶级阵营的对峙和冲突，即“阶级性派别”。忽略派别斗争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类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是造成西方两派学者不同观点的原因之一。

“社会冲突派”没有充分注意到分裂的造反派之间的内斗，因此没有意识到文革中的派别斗争不仅有既得利益者与挑战者间的斗争，也存在挑战者之间的内部冲突。“政治过程派”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片面强调运动的多变过程。真实的情况是，文革是一场博弈，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与作为挑战者的激进派的斗争为主，挑战者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冲突为辅的博弈。文革是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进行的一场非合作式的、信息不明的利益博弈。因此，《运动》用“两类派别斗争”（Two-Type Factional Struggles Explanation）来解释说明文革中的派别斗争。这一观点可以称为“两类派斗说”。

文革对民众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根据推算，民众因参加群众组织受整的面非常广。中学生和知青的受整率为11%~12%，其他民众的受整率达到23%~27%。换言之，文革后，约有四分之一的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民众或多或少地受到整肃。参加造反派的民众更是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民众，出身好的、政治面貌属于红类的、曾为干

部和科员的民众，受整率高于普通民众。

《运动》一书还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分裂和分裂的形式以及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既反对当局对造反群众的恶意妖化，也反对西方左派的过分美化，坚持对群众组织及其领袖给予客观的评价，为今后的民主运动提供借鉴。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当造反派获得一个大的胜利，他们立即分裂，陷入内战，造反派的能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但是造反群众并非永远“死磕”，没有联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的造反派从“清队运动”开始逐步丧失权势，一步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集中营。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造反派们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造反派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成了挨整对象。在后来的运动中，造反派们尽弃前嫌，共同对敌，做最后的拼搏。这是为什么呢？造反派没有能够联合有多种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形势的误判。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了敌人，试图独霸天下。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如果造反派在保守派失败后能够迅速地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改写。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中国社会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运动》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出展望。文革结束后，中国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自1989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然，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推动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借鉴国外（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成功经验，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不无益处。“阿拉伯之春”因参加的人数众多和非暴力而著称，并有以下3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无线”（Wireless）、“无领导者”（Leaderless）和“无阶级”（Classless）。“无线”是指“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的爆发，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体技术（英特网、脸书和推特等）催化并构框的。按照以往的经验，社会运动离不开有效能和有号召力的领导人。“阿拉伯之春”的实践却表明，运动的发动和发展离开领导者也能进行。“无领导者”对运动发展的好处是，能保护运动的精英和骨干。在专制国家里，传统的社会运动常

因为运动组织的主要领袖遭到暗杀或监禁陷于群龙无首的困境。电子网络的出现，为社会运动的领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无阶级”指的是，参加“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抛弃了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分歧，为改变政权万众一心。未来中国的社会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动的参与者能否接受先辈们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在《运动》一书中，作者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对文革中民众参加群众组织的程度、原因和目的，文革后民众受审查和整肃的程度和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采用数值分类法对各省的文革发展进行了定量分类。统计分析包括常见的卡方检验，费雪尔检验，对数回归模型，聚类分析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等，这在文革研究中尚属首创。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作者运用社会运动学中最新的理论论述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本书不仅理论性强，而且言之有据以实证数据为基础。作者力图为文革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做出贡献。🔗

作者介绍

James Wright，美国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荣誉退休教授，曾任该校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美国著名学刊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的主编长达 36 年，著有 30 本论著，300 多篇学术论文，是贫穷问题、无家可归问题、婚姻问题、控枪问题专家。他还是曾全美 Horowitz 基金会的公共政策董事会董事，并担任过国际著名的 Scopus 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社会和行为科学专题主席。他的学术代表作包括：

《国际百科全书社会和行为科学类》第 1-26 卷第 2 版，主编。《枪口之下：枪械、犯罪和暴力》《社会问题：毒品》《带枪且危险的》《恶中之恶：城市贫穷》《无址游民》《契约婚姻》《环境的受害者》《在火线上：都市的少年、枪械和暴力》《失落的灵魂：现代美国社会的礼貌和道德》等。

乔晞华，美国 Tulane 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得克萨斯州司法部研究人员，研究领域：社会运动学、犯罪学、研究方法论、统计学。文革研究论著和论文：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博弈说：再探文革定义”《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红祸》，“轰动南京的一桩红卫兵打死人案”《红墙》等。

其他著作：《西方社会学面面观》《总统制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傲慢与偏差：66 个有趣的社会问题》《多棱镜下：中国电影与时装时尚》。🔗

【评论】

大抓“516”的来龙去脉

刘建业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当时还属于秘密文件），这是毛泽东亲自给陈伯达打电话决定的。毛为何要公开发表不得而知，却给各路造反派带来了丰富的联想——毛刘之外还有个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成员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周就是他们的“黑后台”。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公开宣讲，周“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毛和刘之外）第三司令部的人”。在一些造反派看来，刘少奇的司令部已经垮台，而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就是要向周恩来的“第三司令部”进攻的信号。

由此，炮打周恩来的浪潮愈演愈烈。“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一时间甚嚣尘上，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之势。毛对此不置一词，完全一种放任、默许的态度。

就是在这个形势下，6月14日，北京钢院张建旗、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联手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6月30日至7月2日，“兵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他们人数不多，架子却扎得很大——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有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个方面军。甚至还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他们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散发反周传单，书写反周标语。

8月9日，“516”开展“8.9战役”，大批人员在凌晨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516”能如此猖獗，显然与中央

文革的默许和纵容有关。

其实，“首都516兵团”的理论倒挺有意思——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应该说，他们的感觉倒是蛮对的，只不过认错了人。如果“政变”，“二线向一线夺权”套在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它还认为建国以后十七年“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推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和体制”。这又有点像南斯拉夫吉拉斯《新阶级》中的观点了。

当毛泽东感觉文革这艘大船有倾覆的危险，转而决定抓捕王关戚、借助周恩来时，“首都516兵团”就在劫难逃了。

1967年9月1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扩大会传达了毛的指示：“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516’”。有了尚方宝剑，周恩来在外交系统清洗“516”毫不手软。副部长陈家康——文革初期向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告密：陈毅曾在小圈子里批毛“乾纲独断”——这次也成了“516”。但全国大抓“516”，是否是周主导的，感觉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周是乐观其成的，应该也是不用怀疑的。

我知道，周恩来鉴于历史教训，曾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份大专院校代表时明确指出：对“516”不应扩大化。11月3日，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时，也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不要扩大化，不要弄得什么地方都有‘516’”。

我个人看法，周恩来着眼于小范围的“516”，毛泽东则立足于文革的逐步转向和收场。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特意在上面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可以看出毛决意利用“516”作文章。

实际上，此时“516”已被摧毁。该文锋芒所向，显然已不单单是小小的“516兵团”

（谢富治说不超过 50 人），而是清理“516”思潮和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江青也借此大做文章，分别在 1967 年 9 月 5 日、1968 年 3 月 25 日的讲话中，把“516”扩大为“三指向”，即凡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都是“516”，这下子范围就大大地扩展了。

事实上，各地方当局大抓“516”，还是着眼于“反对红色新政权”。军人当权的省份，再加上大抓“反军派”。比如，以许世友主政的江苏省委（革委）抓人恐怕全国最多吧？持续时间也最长。直到“913 事件”之前毛巡视南方，在上海接见许世友，许还在向毛汇报抓“516”的事情。各地的“红色新政权”，也都很自然的把抓“516”当作他们巩固权力，打击和清除反对派的武器。

抓“516”最大的笑话还是——

1968 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516”运动。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516”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也被列为“516”集团的操纵者。

更为荒诞的是，竟然还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516”集团的操纵者。

“清查 516”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实际上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手段。 

【评论】

关于《文革的边缘人：农民阶层与文革》的几点看法

石名岗

《记忆》252 期刊登了石革文先生《文革的边缘人——农民阶层与文革》一文，通过对文革中农民阶层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阶层虽然是文革的边缘阶层，但这一阶层的数量

是如此之巨大，对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影响都不可低估”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就是矛盾的，即边缘的东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竟是因为数量大？该文对农村文革的分析也很有值得商榷之处。

边缘阶层的概念应该从三方面理解，一是上层对这个阶层的忽视；二是下层对自己社会地位改变的主动性不够；三是客观条件造成阶层的边缘化。

1. 农村问题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农民革命一点也不夸张，说上层不注重农民问题显然不符合事实。从湖南农民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再从土改，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文革的公社情结，中国革命的领袖们为实现农民社会主义理想，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返回到了极点。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实行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似乎又变相地回到土改时的原点。农民问题的怪圈实际上缠绕了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之多。

从成分上讲，革命领袖们多为农村知识分子，或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讲，其思想本质是农民社会主义，与原旨的区别在于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所以说，在建国后出现党内的路线斗争，就是农民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斗争。

文革中的“走资派”的概念主要是体现在农村政策上，即“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及包产到户）政策，而对于城市所有制的看法分歧不是很大。上层对于农村问题显然没有“边缘化”。

2. 农民不愿意被边缘

如果文革中北京的学生运动、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样板，那么山西就是农民运动的样板。

这里重要的原因是，陈永贵率领大寨红卫兵，从大寨杀向昔阳，杀向晋中，杀向省委，最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大寨红旗插遍全国，陈永贵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政治主张：没收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基本核算单位从队提高到大队，乃至公社……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还有一派军队支持的以全国劳模李顺达（中央委员）为首的政治

力量，成为大寨的对立面，即所谓“反大寨”的势力。这一派提出的“三包一奖”（以队为基础包土地、包产量、包工分及超产奖励）是变相的“三自一包”。当时清徐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段立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主张保留自留地、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农副业并举，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农村市场。特别有意思的是，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69军军长谢振华，与陈永贵展开大寨是“先公后私”，还是“大公无私”的争论。后由周恩来裁定“还是‘先公后私’为好”。

1968年至1969年，大寨派和“反大寨”派都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大寨派由省革委支持，“反大寨”派由军队支持，其中至少军队一派的作战主力是以农民为主的基层民兵，在晋中，在晋南，在晋东南的山峦和平原上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运动游击战。战斗中形成了跨县跨区联军，到1969年7月份，发展到了晋南南八县联军围攻地区所在地临汾城的程度，中央不得不发布了《七二三布告》。

实际上，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态度，无论是支持或反对，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农民对文革的强烈的参与性。

3. 农村的走向决定社会走向

客观上讲，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开始，必须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解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参与工业建设，因之，农村的走向决定着社会走向。

当文革把地富反坏右、知青、干部投向农村，或劳改、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劳动锻炼，说明当时贫下中农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支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不亚于工人阶级。由于工人阶级人数少，当时是百姓中生活水平较优越的，虽然名义上是领导阶级，但“革命性”就似乎差了一些。对被专政阶级的管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教育，对干部下放锻炼，这些政治任务就历史地落在贫下中农肩上。把人员大规模地驱往农村，并没有相应的增产，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无疑是社会的倒退。

用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教育社会各阶级，当然是一种思想上的倒退。与经典理论的“按

劳分配”，或“按需分配”，都相去甚远。

文革体现了一个国家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最高思维。一个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发生质的转变，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就是这种质的转变的开始，即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改革。

4. 不能忽视文革的派别性

该文把农村的社会结构简单地划分为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两个阶层，并断言文革的受益者是干部群体。

问题在于：一是农村是否仅有两个阶层，二是文革收益的概念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普通农民至少分为贫下中农骨干、中间群体、地富反坏右被管制群体及农村小知识分子。干部群体也非铁板一块。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收益的概念因当是在文革中获得在文革前所没有的利益，如果干部群体一直是既得利益者，就不存在有新收益的问题。

作者又忽视了文革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文革中农村的干部群体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二是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干部群体，还是普通农民群体，在文革中都分成了至少两大派。

许多地方的农村，四清运动与文革是相连的，四清中的问题成为农村分派的直接原因。四清中被整的干部多成为文革中的造反派，他们的目标对准了四清中得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队，有些地方还有把四清工作队领导揪回批斗的现象。

如果说文革是革命，受益者就是革命者；如果说文革是动乱，受益者就是动乱者；如果用大家都熟悉统一名称，受益者造反者，或曰造反派（或保守派），主要是掌权的造反派（或保守派），在农村也不例外。除了地富反坏右被管制群体外，造反派（或保守派）可以出自农村的各个阶层，实际上造反派形成的群众组织也是多成分的，有基层干部，有农村学生，有青年农民……

考察文革，应该不仅仅看人的社会地位，更应该他在文革中的派别，因为派性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文革，所以我们说获利的是“掌权的造反派（或保守派）”。

至于说到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只是意图维护自己文革前所得的利益，然而很多基层

干部在这个革命中因为站错了队，还失去了先前的利益。

5. 农村受害者甚多

该文说：“文革在农村并不像城市那样轰轰烈烈，中央高层对农村文革曾也有部署安排，但文革的阶段性特征在农村并不明显。由于刚刚进行了四清运动，原来的许多农村干部被打倒，农村的文革开始的也较晚。”“住在中国农村的六亿人，相对来说没有怎么受到革命行动的影响，因为这一运动主要是在城市”

按这一说法，农村是文革中的“世外桃源”。但就是在这个“世外桃源”里，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农村屠杀了325名地富反坏右及子女；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集体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子女近万人；1968年5月到8月，广西以清查所谓“反共救国团”的名义，屠杀“广西422”近10万名群众；还有内蒙的“内人党”事件、云南沙甸事件……

不知作者为何要回避这些人人皆知的事件，而人为地制造一个“安定的绿洲”？在文革十年间，农村的“地富反坏右”是战战兢兢的十年，是屈辱的十年，岂能说“没有怎么受到革命行动的影响”！

【随 笔】

闭卷判分 名人归零

小 鹰

“闭卷判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考场规则，就是考官阅卷评分时，不得知晓考生姓名及背景，它体现了一个社会遴选人材应有的“公平竞争”原则。然而，这种技术层面上“费厄泼赖”的果效曾被大打折扣，这除了文体要求“骈俪八股”，内容只需“死记硬背”之外，后来又有许多优秀人材，或因贯彻“阶级路线”、实行“政治审查”之方针，而遭“不宜录取”，或因以“赞助费”多寡排名次，以“告密者”（信息员）优先考研及录用公职之

规定，而被淘汰，更不用说通过后门关系贿赂舞弊，甚至由领袖、领导直接指定，以求名校录取的丑闻了。

但我这里不是谈这些，而是要谈“思想方法”。

我主张的“闭卷判分”，是指当我们读一本书或听一篇演讲时，不要关心作者是谁，只问其内容是否讲得有道理？如果是“名人”写的，无论头衔是教授、院士、洋人、古人、权威、大师、明星、大款、网红、大嘴，或写过本好书、是某奖获得者，还是受到“口诛笔伐”的文人、学者、“右派”、“黑帮”、“走资派”，那在头脑里也都将其显示的社会声望正负值先行“归零”，专注看他或她所说的见解是否令人信服？立论有无费解之处？主张是否合乎实际？论述是否“无懈可击”？自己能不能提出好问题？等等，然后再比较社会舆论、参考历史环境，从全局做出综合与判断。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保持“独立思考”，防止头脑被“作者”的名声先就“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糊涂了。”¹或者，一看姓名便先生反感，“人云亦云”地带著成见与敌意去阅读，甚至唯恐“中毒”，干脆拒听拒看。

二、以免萌生邪念，先去做“人肉搜索”，查他个现行、私生活和祖宗三代掉底，然后“施用思想以外的工具”²于思想之争。

当然，现实世界不全是考场，阅读不可能都行“闭卷”，而我对“名人”的言论也不免俗，总会多加些关注，但在理智上，我力图把“名声”，无论其好坏，均视作“噪音”滤去，尽量不使自己的判断受干扰。“闭卷判分”凭的是思考和智慧，引的是事实和论据，讲的是理由和逻辑，做的是归纳和演绎；而“开卷答辩”，若是得罪了“名人”或辩护了“罪人”，有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因为“中国一向……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

¹鲁迅，《读几本书》，“花边文学”，1933年5月14日。

²邵荃麟，《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原载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24页及26页。亦见小鹰，《邵荃麟和胡风》，

http://www.azcolabs.com/bd_ql&hf.html。

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¹更何况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²。

以下不避嫌疑，举几个“闭卷判分、名人归零”之先例。

一、1964年夏“人民文学”杂志收到了一份题为《进军号角》的稿件。那是一首长篇的政治抒情诗，有着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的风格。诗稿批判了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批评了国内政治上的官僚主义体系，主张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作者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这份稿件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争议。以往，每当编辑们对稿件拿不定主意时，便按常规向有关领导请示。这次便一直送到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那里，因为“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邵荃麟很快就对这位无名小辈的诗稿破格作了签发，决定在下一期杂志全文发表。于是，杂志的编辑雷奔立刻约见了作者张郎郎，让他对一些小错作了修改。当雷编辑知道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一年级学生，只有20岁，颇为感慨。毕竟，“人民文学”是一份在全国影响重大的一流文学刊物啊！³

邵荃麟签发这篇有些“离经叛道”意味的、小人物的诗稿时，和“人民文学”的编辑们一样，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作者的身世背景，他们只是从作品本身来判断它的价值。

二、还是邵荃麟。1944年在重庆，他曾这样热情地推荐了年仅22岁的青年作家路翎的成名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当我初读了几章之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

¹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1925年12月20日。

²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1907年

³ 小鹰，《由邵荃麟1964年破格签发的一份诗稿说起》，http://www.azcolabs.com/jnhy_xy_poem.html。

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作者所使用的言语，有时似乎太冗琐一点，有些地方因为着色太浓，反而看不清楚。然而我们却也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总之，这是一本不允许我们随意翻翻当作消遣的书。我祈求读者们郑重地来读这一本书——一本好书。¹

尽管那时他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已有了分歧和争论，对于当时有“胡风派”之称的路翎，邵荃麟仍能够不“因人废言”，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他实践了自己关于文艺批评的原则：

向来一般批评家往往是先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然后根据他的结论去分析作品，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先分析作品的内容，然后指出他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发掘它的根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²

1953年邵荃麟出任“人民文学”主编，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了。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且私下里对巴金也称赞过路翎的小说。

¹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496页。

²邵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196页。

这是因为邵荃麟认为，“胡风和其它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当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¹

显然，邵荃麟是一位没有宗派或门户之见的文学评论家。

发表作品，不看姓名背景、不看他人脸色，只看文章本身的水准和价值，这就叫作“闭卷判分”。

三、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²

1936年6月1日，美国“物理评论”编辑部收到由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罗森署名的论文，标题为《引力波存在吗？》，声称证明了引力波并不存在。这个结论引起了编辑，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泰特(John T. Tate)的注意，因为当时引力波已成为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预言，尽管尚未有实验支持。为慎重起见，7月6日泰特把该论文送交匿名同行审阅。

审稿者于7月17日送回泰特一份长达十页的评论报告，其中指出论文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作者在概念上把可以用数学变换处理的座标奇点与真实的物理奇点混同了起来。泰特旋于7月23日将稿件及该匿名评论报告一起退还给爱因斯坦。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泰特温和地要求他回应审稿人的意见和批评。

但从未遭受过退稿的爱因斯坦却勃然大怒，7月27日他用德文回信给泰特说，我和罗森“没有授权你在文章发表之前拿给专家们看。我也没有理由来谈论你那位匿名专家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评论。因此，我宁愿在别处发表这篇论文。”

7月30日泰特回信表示对爱因斯坦的撤稿感到遗憾，同时又坚定地表明“如果作者不同意将论文在发表之前交给编委会审阅，我就无法在‘物理评论’上刊发它。”

之后不久，1937年1月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发表了爱因斯坦和罗森的论文，但题目已改为《论引力波》，且结论反倒是肯定引力波的存在了。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¹小鹰，《邵荃麟和胡风》，http://www.azcolabs.com/bd_q1&hf.html。

²Daniel Kennefick, 《Einstein Versus the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Today, vol. 58, no. 9, p. 43, 2005.

原来，1936年，相对论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逊(Howard P. Robertson)结识了爱因斯坦的新助手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当他们谈起爱因斯坦关于引力波不存在的“证明”时，罗伯逊坦言他不相信爱因斯坦的结果。英菲尔德即刻把罗伯逊发现的错误转告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他也意识到转投的那份稿件中有错。但只是在听说罗伯逊指出可以用坐标变换来处理数学奇点之后，爱因斯坦才找到了引力场方程严格的圆柱波解，结果反而证明引力波存在之可能。因此，1936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连忙写信给富兰克林研究所，承认提交的论文有误，要做重大修改。在最后发表的文本中又加注感谢“我的同事罗伯逊教授在澄清原来错误上给予的协助。”

其实，早在1925年奥地利的物理学家贝克(Guido Beck)就已求解了引力波的圆柱解，但鲜为人知；而那位匿名审稿人也只提到1926年有两位英国数学家关于度规系数中奇点的讨论，可惜自负的爱因斯坦没有去查找这些先前有关的工作，否则他们会更早些求得对自己困惑的解答。

六十九年之后的2005年，“物理评论”公开了早年稿件处理档案，此时人们才发现，当年曾被爱因斯坦不屑一顾的那位匿名审稿人原来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逊教授。罗伯逊教授的敏锐和见解令人钦佩，但是，如果没有泰特教授的丰厚学识与坚持原则，也就没有爱因斯坦后来的光辉。2015年9月14日人类首次探测到来自宇宙深空的引力波。

泰特教授当年把论文送交匿名同行评阅，显然不是刻板地照章办事，因为，在此之前，他对于爱因斯坦的两篇论文，即质疑量子力学完备性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EPR)佯谬》和关于宇宙虫洞的《爱因斯坦—罗森桥》的论文，都是未经同行审阅便直接予以发表的。由于论文并无明显错误，又有名人挑战传统的新意，编辑部没有必要扣压送审。尽管这两篇后来成为对爱因斯坦最有争议的文章，却大大推动了量子物理和宇宙论的研究。

泰特教授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爱因斯坦从此再也没有给“物理评论”投过稿件。杂志失去了物理学界最负盛名的一位作者，然而，执业界牛耳的“物理评论”水准和声誉不减反增。

发表论文，不拘诺奖头衔、不惧权威脾气，只看新论文本身的水准和价值，这就叫作“名人归零”。

学术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并不必须要与编辑或名人的看法一致，杂志应是一个争议的平台，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应发表，否则很难创新。理科尚且如此，文科更不例外，因为判断后者的是非正误标准，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实践检验的周期也比较长，要鼓励争鸣才好。

即使发表的文章有错，那又何妨？英菲尔德主笔写作与爱因斯坦联名的通俗读物《物理学的进化》时，曾对爱氏说：“我要特别地小心，因为您的名字将会出现在封面。”爱因斯坦大笑地回答：“你不必如此关注这一点，在我名下也有过不正确的论文啊。”权威尚且有错，且能知错改错，何况余等后生？世上又岂有“句句是真理”之人与之理耶！若是顾忌批评名人会使其声誉受损，或“影响不好”，便“不宜发表”，那就十分愚蠢了。

然而，与“闭卷判分、名人归零”之精神相反的，却是“追星捧月、抱团取暖”的习俗。即，只要是派内的“星星”和“月亮”，无论说什么话，写什么书，都彼此点赞叫好，“大力推荐”；而圈外人的批评、异议和质疑，则被归为“异类”、“体制内”，被骂作“脑残智障”、“顽固不化”，甚至迁怒于“编辑让这样的文章发表，也属无知！”或者，干脆“置之不理”，用“轻蔑”叫你自行“闷死”去。要开个什么“文革研讨会”呢，主持的“清规戒律”也甚多，像是不准谈“路线斗争”和“回归新民主主义”，不准谈刘少奇和马克思，也不准谈林彪，……，与会者只能谈主持们认可的内容和看法。据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会引起争议”，“要谈到会后去谈！”看来，“研讨”并不是会议主持者的目的，会议嘛，还是要开成像“九大”那样的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何等光彩！——面孔换了一副，头脑还停留在文革之中。

早在1941年，邵荃麟曾这样写道：

在学术的论争上，对己必须具有严谨坚决的立场，对人则采取宽大诚恳的态度。是非之争，不要丝毫混淆，但无意识的谩骂或无谓的人身攻击，则必须戒避；而采取学术论争

以外的手段来排斥对方，尤所不许。对于对方的理论观点，必须明白了解，勿故意曲解，对自己的错误，必须勇敢接受，勿逞强辩，然后始能发扬学术论辩之真正精神。¹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读来，也是有启示的。归根结底，所有那些妨碍“学术研究”，打压“独立思考”的行径，也可以说是承传了祖上“宗派文化”和“名人崇拜”之恶习。

“所谓宗派主义(Sectarism)”，邵荃麟写道，“乃是指对于异我者的领袖与群众加以拒绝与歧视。”1936年8月他参与文坛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撰文明确支持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同时亦感叹由于“统一战线”的内斗：“结果在历史上遗留下许多悲剧，甚至还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他看出“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而不肯去虚心检查究竟错误属于哪方。甚至固执成见，不肯接受批评。”“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必然会使统一战线内产生许多麻烦的纠纷。”²

而“名人崇拜”在文革期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伟大领袖”一挥手，千万“红卫兵”和“造反派”便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地去打倒“走资派”，“誓死捍卫‘心中的红太阳’”，“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毫无独立思考与分辨能力。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因此，以上所述，就不只是限于个人“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可能会衍生成为严重的“社会文化”之弊病了。

¹邵荃麟，《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原载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24页及26页。亦见小鹰，《邵荃麟和胡风》，http://www.azcolabs.com/bd_ql&hf.html。

²邵荃麟，《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8月7日，原载1936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34页。

【封面】

血色碎片

——对文革纪念的思考

邹行

行走于德国小镇，古朴的建筑之间，有些道路是由一块块方形的青石块拼接而成。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石块和其它的不同，阳光下，金灿灿的颜色十分显眼。在这些不一样的金色石块上，雕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都是由同一句式开启：

“HIER WOHNTE”，译成中文是“这里曾经住着”，接下来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这些石头名叫“绊脚石”（Stolpersteine），是由德国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所谓“绊脚石”，是棱长10厘米的立方体混凝土块，其中一面贴嵌了一块镌刻着专门纪念文字的黄铜板。有时，以长条形出现的绊脚石也被称作绊脚坎（Stolperschwelle）。这个艺术项目的目的是纪念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被纳粹政府谋杀、驱逐和逼迫自杀的人。刻有受难者姓名的绊脚石，就是他们的纪念牌。通常，绊脚石铺设在受难者生前住所门前的路面上，与普通的铺路石平齐。目前，已经有55000块绊脚石被铺设在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

这个艺术计划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纪念碑”形式，对于历史事件中受害者的纪念，不再是树立一座巨大的丰碑，然后忽略其中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而是从每一个具体的人出发，用一种生活化的物品来记忆每一个人，再由巨大的数量，达到纪念碑的历史厚重感。

与上世纪德国极右政治的血腥漩涡相似，中国在上世纪中后期，也深陷一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之中：十年文革，受害者不计其数。那么，如何为这些受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呢？

德国艺术家的工作给了我很多启发，同时，在创作设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来自“绊脚石”计划，和对文革受害者纪念碑所处情境的不同。我会逐一分析这些不同，并说明这些不同时如何对创作造成影响。

对两者的不同，我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承载物的选择；第二，展示方式和空间；第三，承载物特性和历史、记忆特性的符合。

第一，承载物的选择：

承载物，就是雕刻受难者名字的生活化物品，“绊脚石”计划选择的是铺路用的青色方形石块。用方形石块铺路是欧洲城市道路建设的传统，从中世纪开始出现，现在在欧洲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依然非常常见。由于欧洲城市建筑良好的保护措施，更多的是重修维护，而非拆毁重建，所以当年受难者被带走是走过的石头路，如今依然多被继续使用。在受难者曾经住所的门前，在最后离开的道路上，镶嵌一块刻有他们名字，和生死日期的铺路石，这个承载物的选择十分巧妙，而且纪念效果非常优秀、直观。

而中国的情形呢？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风貌巨变，很多地方都彻底变了样子。在这场城建的巨变当中，建筑经历得更多的是拆除重建，而非修复保护，而且，这种风气并没有改变的趋势。曾经的地点面目全非，如今的建筑和道路，也面临在未来可能面目全非的不确定性。当今中国，由钢筋水泥保存的历史记忆，其实处境十分脆弱。所以文革受难者纪念碑承载物的选择，就无法像“绊脚石”一样，选择地理指向性的生活化物品。

第二，展示方式和空间：

“绊脚石”计划的铜制铺路石，直接铺在受难者曾经住处的路面上，存在于一个公共空间，自然对公众的观看没有限制。

纪念碑在公共空间的存在，意味着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对本民族和本国政治的批评和反思，没有官方的限制和阻挠。一切有关这一话题的“话语”，都是可以存在于公共空间，由大家观看、思考、发表评论的。

而在中国，对于文革那段历史的研究、挖掘，对当时国民和政府的批判、反思，都还

远为达到可以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可能，来自各方的阻力都非常大。所以，文革受难者纪念碑自然也不可能自由的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里面安装、展示，它将具有一个特殊的“私密性”。同时，作为纪念性物品，又必须具有可以被公众看到的“可视性”。所以，文革受难者纪念碑的选择和设计，必须满足一种存在空间的双重性。

第三，承载物特性和历史、记忆特性的符合：

欧洲对于极右政治的缺陷，法西斯政府的暴行，从二战结束之后就开始进行研究和反思，在这样的思潮之下，无数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不断地书写，创作，去剖析那些暴行的原因，汲取那段历史的教训。

“绊脚石”计划使用的铺路石，方方正正，混凝土和铜混合材质所体现的“重”的感觉，十分契合那段历史的沉重感，和对历史回望中体现的厚重感。

而对于文革历史，当今中国并没有出现政府推动和鼓励而形成的大规模研究，以及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潮流。文革历史研究，从没有被放到一个完整的学科框架下，和不同的学术体系相结合，运用当代不断发展的各类研究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等等不同的视角之中进行分析，相互碰撞，形成多维立体的历史书写和反思。文革历史研究在中国更多的是民间自发开展，且需要面对意识形态带来的种种压力和阻挠。研究的动力多来自于亲历者的热情和良知，自然无法具有官方教育体系中具体学科设立所拥有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民间文革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和这段历史的巨大体量相比，杯水车薪。这段历史和记忆的处境，依然是十分易损、脆弱的。随着时间推移，在未来，当亲历一代人的逐渐逝去，这段历史的样貌会越来越模糊。而且，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中，还看不到扭转这种脆弱性的可能。

由以上三个情境特点，我开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碑的设计。通过分析，我们看到，纪念碑的设计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1. 采用的材料必须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2. 纪念碑的存在和展示，必须具有私密性和公共空间中的“可视性”。

3. 纪念碑所展现的特性，需要符合文革历史、记忆在中国文化社会背景下的特性。

从这几点出发，我最终选择了红色玻璃作为承载物，因为玻璃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1. 玻璃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是制作窗户的材料。

2. 窗玻璃在一个家庭空间中，是以一种边界的方式存在的，它既是墙壁的一份子，标识出了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具有在私密空间存在的属性；同时，它又是视觉上，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联接的通道，具有在公共空间被观看到的“可视性”。

3. 玻璃具有其他物品不具有的易碎性，这种特性符合这段历史和记忆所具有的脆弱性。玻璃製品美观大方，但一旦遭受外力，被推离自己所处的位置，从高处掉落，或者收到暴力敲击，都会破碎，这一特点，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受难者所遭受的命运。

选择好了纪念碑的承载物，我接下来用几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创作细节，和其中的思考和含义。

1. 颜色：

制作文革受难者纪念碑的玻璃为红色，这是一个非常直接和快速的选择，因为红色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之中，在艺术联想之中，具有太多的特征：这是文革十年的颜色，是象征着那段政治狂热史和其中暴力的血色。

2. 切割：

不同于“绊脚石”整齐划一的风格，文革受难者纪念碑的製作，是将一块巨大的红色玻璃板，以不规则的方式，甚至损毁的方式，切割成很多形状不同的小块。这样的製作过程，和呈现效果，是想用艺术的方式，以“破碎”、“碎片”的观感，来呈现受难者的命运：突然来临的政治暴力，将鲜活的生命打破，成为一片片历史书页之中的“血色碎片”。碎片的边缘十分锋利，不时割痛触碰那段历史的人的双手和内心。

碎片不同的形态展现受难者不同的遭遇。而且，当将这些碎片集合在一起时，毫无规律可言的破碎痕迹，也暗喻著曾经的暴力是多么的荒谬、无理。

3. 日期：

在血色碎片的制作中，我没有雕刻受难者的出生日期和地点，只选择了他们死亡的日期和地点。

“出生日期——死亡日期”，一个完整的人生旅程，传统的纪念形式。但是这种传统的书写方式，和一个普通的墓碑并无二致。这样的书写方式，没有错误，但缺少力量。文革受难者纪念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那一天，这些被镌刻名字的人以不寻常的方式离开人世间。玻璃上雕刻的名字，以最简洁的方式以纪念受难者，离世的时间和地点，宣告这一切存在的原因。

文革受难者纪念碑不应是一个平和的“纪念品”，而是要用鲜红的色彩，用信息的简略来凸显，这一片片碎片，都是那个日期，那个地点，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滴血。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
